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七十八本，第三分
出版日期：民國九十六年九月

花園子與花樹店——明清江南的花卉種植與園藝市場

邱仲麟*

明清江南地區，由於文人、富人、妓女多，加上節慶、交際、休閒活動頻繁，對於花卉的需求甚大。因此，許多大的城市，如南京、揚州、蘇州、杭州與上海，在城市外圍出現了專業化的園藝種植。更因其經濟利潤高於種植稻米，許多農田紛紛轉為花田，栽植各種奇花異卉。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八世紀末，蘇州種花業者與花卉商人組成了花商公所，後來上海在十九世紀末也出現同樣的組織，可見花卉業者之間的組織與聯繫日趨緊密。

另外，許多專事栽培特種花卉的花匠，為了招徠上階層客人光顧，以賺取更大利潤，無不尋求技術上的革新與品種改良。十八世紀末，揚州、蘇州等地出現了塘花法，上海在十九世紀也隨之跟進。原在春天才開花的許多花卉，透過此一技術，農曆春節前後已經上市，成為大家競相選購的商品。除了塘花法之外，又利用嫁接等技法，栽植非江南原生的花卉。而隨著城市之間的互相競爭，個別花卉的栽培中心常有轉移，如明代時栽植牡丹的中心，由蘇州轉至江陰，清代時上海又取而代之。水仙栽培本以嘉定最負盛名，清初時南京已經加以超越。在技術競爭之下，花匠無不保守其技術機密，防止外人竊取。盆景之栽培，更呈現風格上的競爭。明初以來，南京、蘇州的盆景各自有其市場。至十七世紀初，嘉定的盆景異軍突起，成為江南最受讚譽的名品。至清代，雖然蘇州、揚州、杭州等地也有盆景栽培，但嘉定盆景還是相當有名，原因即在於其盆景風格最具畫意。

在市場交易方面，江南是明清最大的花卉消費市場。其貿易網絡，以蘇州為中心，西北至南京，北至揚州，西南至杭州，成為一個涵蓋二百五十公里的市場圈。花卉的交易主要透過水路，船隻扮演重要角色，清代花農甚至利用夜航船載花入城售賣。必須指出的是，明清江南的花卉交易，呈現蜘蛛網式的交織，而其交織的密度是空前的。除了江南各城市彼此貿易之外，江西、福建的許多花卉，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如茉莉花、蘭花等，也透過水路或陸路，運至南京、蘇州、杭州、上海等地。清代以後，東南沿海的出海管制逐漸鬆綁，福建、廣東的蘭花、茉莉也由海船運來，貿易圈進一步擴大，供貨量與到貨的速度均較以前增加。而且，隨著對外貿易日增，外國的花卉也傳進來，成為市場上的新貴。至於花市交易，賣連根花木、盆栽、花枝，及賣簪戴花蕊者，各有其不同的市場，彼此互相區隔。花市交易有一種撮合買賣的中間商，交易完成後從中抽取佣金。有些花商則至花田中直接訂花，而大部份的花卉均由花農挑入市中交易，或在大街小巷中叫賣。另外，明代的南京，清代的蘇州、杭州，還提供顧客租花回家擺放。清代揚州的花匠，於庭園中代客佈置花卉，甚至提供保固的服務。

關鍵詞：花商公所 塘花法 技術機密 盆景風格 貿易網絡

前言

清朝初年，吳偉業 (1609-1671) 曾以詩餘讚頌江南，其中一闋詠道：「江南好，蘭蕙伏盆芽。茉莉縷藏新茗椀，木瓜香透小窗紗，換水膽瓶花。」[1] 短短數語，道出了江南居家花事的韻味與感觀之美。眾所知，明清江南的城市，文人多、富人多、妓女多、節慶多、交際多、休閒多，在這樣的環境下，花與這些人、這些活動的聯結相當密切。明代中葉以後，士大夫與富豪對於花卉的興致，與花卉的賞玩文化達於空前。除庭園中栽植或擺放花卉外，花木盆景尤其是流行文化之嬌客，瓶花亦是居家不可或缺之物。明清時期，江浙文人對於盆景、瓶花更有理論性的探討。[2] 此外，以城市上階層爲首的節序賞花、花會雅集，也成爲江南的重要休閒活動。對於花卉的熱愛，尤其表現在定期的賽花會上，如清代蘇州的插花會，上海的菊花會、蘭花會即是其例。[3]

---

[1] 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二一，〈望江南一十七首〉，頁534。

[2] 參見邱仲麟，〈宜目宜鼻——明清文人對於瓶花與盆景之賞玩〉，發表於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辦，「明清文化生活與集體記憶」研討會（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07年5月28-30日）。

[3] 參見邱仲麟，〈明清江浙文人的看花局與訪花活動〉，《淡江史學》18 (2007)，待刊稿。

明清江南城市這些對花卉的賞玩活動，是在城郊大面積花卉栽培的基礎上展開的。玩賞花木與園藝栽培兩者，正如康熙初年劉廷璣 (?-1676) 所說的：「種花人本爲射利，而愛花人各具性情，春光成就，能兩得之」，[4] 雙方面是相互激盪且互利共榮。有關於明清花卉園藝之發展，已有不少農史學者論及。[5] 就江南地區而言，也有專著加以討論。[6] 前此學者的諸多論著，對於本文幫助甚大，惟其脈絡主要是通概性的描述，非以城市做爲主體加以分析，對江南花卉的交易亦未有深入探討。本文選擇南京、揚州、蘇州、杭州與上海做爲主要觀察的城市，內容分爲三個部份，其一談城郊花卉種植情況與清代塘花法之復興，其二談專業栽培與技術改良，其三則談市場擴張與花木批發之情況。要說明的是，江南一般指蘇州、松江、常州、湖州、嘉興、杭州六府，[7] 本文所言的江南，比較屬於文化圈上的意涵，故將南京、揚州亦納入討論。（參見圖一）

---

[4] 清・劉廷璣撰，張守謙點校，《在園雜志》（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三，〈西溪香國〉，頁116。

[5] 如程兆熊，《中華園藝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頁288-388；葉靜淵，〈我國明清時期的花卉栽培〉，《農業考古》1987.2：308-315；黃長椿，〈明代江西贛州的種花業〉，《農業考古》1990.1：209-210, 213；舒迎瀾，〈我國古代的花卉栽培〉，《自然科學史研究》9.4 (1990)：363-365；陳俊愉、程緒珂主編，《中國花經》（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頁9-12；陳文華，《中國古代農業科技史圖譜》（北京：農業出版社，1991），頁501-504；舒迎瀾，《古代花卉》（北京：農業出版社，1993），頁18-23；王賽時，〈明清時期北京的花卉業〉，《古今農業》1994.3：30-38；周肇基，〈花城廣州及芳村花卉業的歷史考察〉，《中國科技史料》16.3 (1995)：9-11；吳存浩，《中國農業史》（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頁1052-1053；汪子春、范楚玉，《中華文化通志・科學技術典・農學與生物學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111-118；嚴奇岩，〈淺談明清雲南花卉資源的開發〉，《農業考古》2003.3：230-233；施春煜，〈明清虎丘花市〉，《滄州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5.1：61-62；洗劍民、許五洲，〈清代廣州的花卉消費〉，《江蘇商論》2005.5：163-164；陳文華，《中國古代農業文明史》（南昌：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頁335-337；〈宋元明清時期的花卉種植業〉，《農業考古》2006.1：216-222。

[6] 參見南京農業大學等編著，《太湖地區農業史稿》（北京：農業出版社，1990），頁285-321。

[7] 江南在廣義上可包括南京以下的長江三角洲，通常指蘇州、松江、常州、湖州、嘉興、杭州六府，但也有學者認為是蘇州、松江、常州、湖州、嘉興與鎮江六府。

一・城市周邊的蒔花業

據學者指出，魏晉南北朝時，江南一帶已有芍藥、菊花栽培。唐代，特別是盛唐以後，江南花卉栽培初具規模。至南宋，以杭州爲中心達到一個高潮，產生了專事種植花卉的專業區，即錢塘門外溜水橋的東馬塍與西馬塍諸園圃，同時花卉也成爲重要的商品。明代以後，伴隨著江南園林之盛與造園學之興起，花卉生產技術與花卉市場也得到更大的提升。[8] 尤其是在明中葉以後，江南商品經濟蓬勃發展，[9] 花卉種植也成爲重要產業。在這個過程中，省會所在的南京與其他幾個府城，如揚州、蘇州、杭州與上海，其城市周邊的花木栽培也越來越盛。以下先討論城郊的花卉種植狀況，再分析江南城市花樹業者的組織化，與清代塘花法重新引入江南的情況。

園圃栽培

金陵的花卉栽植，早在六朝已有之。[10] 至明代，金陵首度成爲統一王朝的首都，宮廷之花木需求甚大。即使永樂時首都北遷，金陵猶爲兩京之一，宮殿擺設與官員需求仍在，花木栽培未衰。據正德《江寧縣志》記載，南京出產牡丹、芍藥等花卉，芍藥花種雖來自揚州，但「金陵培植獨盛」。[11] 而城南七里的華嚴寺即到處是花田。萬曆年間，于若瀛 (1552-1610) 有詩云：「城南華嚴寺，寺僧皆種花。每當花開時，雰芳爛若霞。」[12] 華嚴寺僧人所種之花以梅樹最多，白花與紅花者價錢相當，綠萼、玉疊者則價值加倍，樹枝必以「絲縛虯枝，盤曲可愛」。[13] 于氏又記到金陵附近山谷間產山蘭，每當花季時，小兒入山掘取，「以

---

[8] 參見南京農業大學等編著，《太湖地區農業史稿》，頁291-314。

[9] 關於明清江南商品經濟的發展，范金民所著《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一書有全面性的討論。

[10] 參見舒迎瀾，《古代花卉》，頁5。

[11] 明・王詰、劉雨纂修，正德《江寧縣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第24冊，據明正德年間刊本影印），卷三，〈物產〉，頁11b。

[12] 明・于若瀛，《弗告堂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第46冊，據明萬曆三十一年刊本影印），卷三，〈華嚴寺〉，頁13b。

[13] 同前書，卷四，〈金陵花品詠〉，頁5a。

水瓦盆持鬻於市，其值甚賤而香不減建種，每置數叢窻間，清芬忽來，品亦不下」。[14] 至清代，金陵雖不再是陪都，但還是省城所在，花卉栽培仍相當盛。厲鶚 (1692-1752)〈金陵移梅歌〉云：「蔣陵氣暖首靈谷，花匠家多住鳳臺。根蟠數世仍護壖，萼點十月先含胚。」[15] 所詠即靈谷寺梅花，與鳳臺門外花匠。道光年間，《金陵待徵錄》記載：鐵線蘭產於朱門山，葉與莖皆細，莖與花皆深綠色，微近黑色；品字蘭產於雲臺山，花開必三勻如品字。[16] 甘熙 (1797-1857) 則談到南門外成仁庵僧人善養菊花，多有異品，小盆短幹者謂之「宿缽」；而城外西北的象房山，也是「土人蒔花之所」。[17] 另據同治《上江兩縣志》記載：「城外鳳臺門民善藝花及金橘，城內五臺山民善植梅，雞籠山後人善藝菊，皆以名其業」。[18] 陳作霖 (1837-1908)《金陵物產風土志》亦言：「城內五臺山民善植梅，寶林寺僧善種牡丹，雞籠山後人善蓺菊，城外鳳臺門花傭善養茉莉、珠蘭、金橘，皆盆景也。」[19] 晚清南京雞鳴山後多種菊花，其中蔡氏晚香山莊所栽之「宿鉢」最爲珍貴，「文人詞客，每屆花時，不惜騎驢遠訪，自選佳種，解杖頭資購之」；至菊花上市時，即使是菜傭、酒保，亦必力購數花，置於瓶碗之間，「點綴六朝烟水氣」。[20]

自唐宋以來，揚州（江都）以種植芍藥著名。北宋蘇軾 (1037-1101) 曾有「揚州芍藥爲天下冠」之語，孔武仲 (1041-1097) 也說：「揚州芍藥名於天下，與洛陽牡丹俱貴於時，四方之人盡皆齎擔金帛，市種以歸者多矣。」[21] 明代時，揚州芍藥雖然不如唐宋，但仍然相當有名。王穉登 (1535-1612) 在給朋友的信上

---

[14]《弗告堂集》卷四，〈金陵花品詠〉，頁4b。

[15] 清・厲鶚著，清・董兆熊注，陳九思標校，《樊榭山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續集卷四，〈金陵移梅歌為嶰谷半查賦〉，頁1225。

[16] 清・金鰲輯，《金陵待徵錄》（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鈔本影印，1983），卷一〇，〈志物〉，總頁172。

[17] 清・甘熙，《白下瑣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六年築野堂刻本），卷六，頁17a；卷八，頁27b。

[18] 清・汪士鐸等修纂，同治《上江兩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同治十三年刻本影印，1970），卷七，〈食貨〉，頁10a。

[19] 清・陳作霖，《金陵物產風土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四年陳氏可園刊印本），〈本境植物品考〉，頁4b-5a。

[20] 夏仁虎，《歲華憶語》（南京：南京出版社標點本，2006），〈看花〉，頁62。

[21] 參見舒迎瀾，《古代花卉》，頁195-196。

也說：「揚州瓊花烏有，乃芍藥大如牡丹，多佳本。」[22] 當時，揚州多鹽商大賈，芍藥開時，商人多延賓觀花。[23] 至清代，揚州城郊仍多芍藥田。如康熙年間，花農在二十四橋旁種植芍藥，園內面積四十畝，其中十餘畝爲芍藥田，設有草亭，花期時「賣茶爲生計」，田後並栽植梅花八、九畝。康熙五十五年(1716)，翰林程夢星 (1679-1755) 退職返鄉，購下該處花田，構築園林，即篠園。[24] 另外，乾隆元年 (1736)，蘇州人汪鬋來到揚州，原在枝上村賣茶，與李復堂、鄭板橋 (1693-1765)、詠堂僧等交友，後來亦於城北購買花田種芍藥，是爲芍園。[25] 嘉慶初年，林蘇門（約1748-1809）亦談到：「揚州芍藥，以金帶圍馳名，近日奇異之種勝於昔，而三賢祠尤多」。[26] 三賢祠即程氏篠園所在之處，可見該處芍藥種植仍相當繁盛。直至晚清，揚州依然多芍藥。民初王振世《揚州覽勝錄》曾記城東沙河一帶，居民以種花爲業，而尤以芍藥爲大宗，每年暮春，村人擔花入城，到處販售，「一時紫陌香街，盡成花市」。[27] 倪澄瀛 (1875-1935)《再續揚州竹枝詞劫餘稿》詠道：「萬紫千紅芍藥田，徐凝門外暮春天。擔頭挑向城中賣，一握花枝值百錢。」[28] 揚州除了芍藥之外，菊花亦頗聞名。康熙《揚州府志》記載：「菊種亦近年爲繁，土人多從治中移佳本，園師有鬻于市者。」[29] 府城江都的菊花，成爲府內它縣百姓競相購置的花卉。乾隆年間，揚州

---

[22] 明・王穉登，《謀野集》（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年間郁氏玉樹堂刻十卷本），卷八，〈與吳山人〉，頁20b。

[23] 明・蕭士瑋，《南歸日記》（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08冊，據清光緒年間刊本影印），丁卯三月廿九條，頁8a。

[24] 清・李斗著，蔣孝達校點，《揚州名勝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卷四，頁51。

[25] 清・李斗著，汪北平、涂雨公校點，《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六，〈城北錄〉，頁143。鄭燮有〈懷揚州舊居〉詩，述及其與賣花翁汪鬋之交往，見清・鄭燮著，王錫榮註，《鄭板橋集詳註》（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頁153。

[26] 清・林蘇門，《邗江三百吟》（收入《中國風土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3〕，第27冊，據嘉慶十三年刻本影印），卷一，〈三賢祠芍藥〉，頁10a。

[27] 王振世著，蔣孝達校點，《揚州覽勝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卷四，〈東郊錄〉，頁95。

[28] 倪澄瀛，《再續揚州竹枝詞劫餘稿》（收入夏友蘭等編，《揚州竹枝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頁98。

[29] 清・崔華、張萬壽纂修，康熙《揚州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5-1997〕，史部第214冊，據清康熙年間刻本影印），卷七，〈物產〉，頁14a。

城北的傍花村，居民多以種菊維生，「薜蘿周匝，完若墻壁。南鄰北垞，園種戶植。連架接蔭，生意各殊」。[30] 除了傍花村，北郊的堡城、綠揚等地也以種菊著名。《揚州覽勝錄》記載：堡城數十戶人家，世世種花爲業，春以盆梅、月季爲大宗，夏產梔子，秋以菊花爲最盛；其次則北門之傍花村、綠揚村、治春花社，產菊亦頗盛。[31]

蘇州花卉之種植，唐宋時已相當盛。北宋末年，進獻花石綱的朱勔 (1075-1126)，在盤門內有園林，種牡丹數千本。花開時，「以繒綵爲幙，帟覆其上，每花標其名，以金爲標榜，如是者數里」。其園夫、畦子，亦皆精於種植之藝。及其墮敗，所種牡丹皆被砍以爲薪。[32] 後來，朱氏族人據說多以種花爲業。如嘉靖年間，黃省曾 (1490-1540) 云：

> 朱勔子孫，居虎丘之麓，尚以種藝壘山為業，遊於王侯之門，俗呼為花園子；其貧者，歲時擔花鬻於城市，而桑麻之事衰矣。[33]

清代虎丘花田仍然甚多。康熙年間，楊模〈虎丘竹枝詞〉云：「山前多半賣花翁，茉莉洋茶間鹿蔥。白石長盆栽小樹，儼然林壑是天工。」[34] 乾隆年間，顧瑤光《虎邱竹枝詞》也詠道：「金昌門外萬人家，百計生涯總爲花。」又云：「小園俱是種花家，慣截凡根皆異葩。開日不教蜂蝶鬧，摘來城裏賣瓶花。」[35] 乾隆《元和縣志》則說：虎丘人善於磁盆中，種植盤松、古梅、時花、嘉卉，做爲几案玩賞之物，一花一木，皆有可觀，「人家苑囿中，有欲栽培花果，編葺竹屏草籬者，非其人不爲工」。[36] 咸豐八年 (1858)，袁學瀾（一名景瀾，1803-1880）

---

[30] 《揚州畫舫錄》卷一，〈草河錄上〉，頁23-24。

[31] 同前書，卷一，〈北郊錄〉，頁31-32, 33, 34-35。

[32] 宋・龔明之撰，孫菊園校點，《中吳紀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六，〈朱氏盛衰〉，頁146。

[33] 明・黃省曾，《吳風錄》（收入明・馮夢龍輯，《明人百家小說》〔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明末刻本〕，第52帙），頁3b-4a。

[34] 清・楊模，〈虎丘竹枝詞〉，收入趙明等編，《江蘇竹枝詞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頁651。

[35] 清・顧瑤光，《虎邱竹枝詞》（收入王利器等編，《歷代竹枝詞》〔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第1冊，乙編），頁914。

[36] 清・沈德潛、顧詒祿修纂，乾隆《元和縣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000〕，第696冊，據清乾隆二十六年刻本影印），卷一〇，〈風俗〉，頁8b。

亦云：「虎邱種花農，稱花園子。猶有朱勔後人，以賣花爲業者。」[37] 虎丘的花匠，據道光年間《桐橋倚櫂錄》記載：

> 種植之人，呼花園子。營工于圃，月受其值。以接萼、寄枝、剪縛、扦插為能。或有于白石長方盆，疊碎浙石，以油灰膠作小山形，種花草于上為玩者，優劣不侔。盆景則蓄短松、矮柏、古檜、榆椿、黃楊、洋楓、冬青、洋松，并有所謂疙瘩梅者，咸以錯節盤根、蒼勁古致為勝。蒼蒲以細葉菁蔥圓齊為貴，虎刺、雀梅以精小為上。[38]

引文內容主要談的是盆景，至於其他花卉，草本、樹木及結實類，品種之多，不勝枚舉。[39] 除虎丘之外，光福、洞庭山等地也以種花著名。如牡丹俗稱穀雨花，蘇州「無論豪家名族，法院琳宮，神祠別觀，會館義局，植之無間，即小小書齋，亦必栽種一二墩，以爲玩賞」，種牡丹花者多爲洞庭山及光福鄉人，「花時載至山塘花肆求售」。[40] 其價錢高者，「十戶中人賦，買栽者不吝惜」，[41] 可見牡丹利潤之高。晚清何廣生 (1846-1916)〈光福後竹枝詞〉詠道：「橐駝絕技屬山家，花木成畦整復斜。天井梅椿董墳桂，一年巖戶好生涯。」[42] 光緒《光福志》亦載：光福西北多山，適合種植花果、雜樹，山中人業此而販運四方者十有七八，牡丹、薔薇、木樨、菊花、海棠即其名產，而光福山中栽梅爲業者恒十之七。[43]

杭州花卉栽培，大盛於唐末以降，據史料記載：「唐末吳俗極喜種花，陸魯望住淞陵，家近馬塍，諸藝花戶在焉。杭之西湖隙地亦有花場，號西馬塍。」當時，錢仁傑擅長此業，所栽花卉多異品，人稱「花精」。[44] 至南宋時，杭州因爲

---

[37] 清・袁學瀾，《續姑蘇竹枝詞》（收入《中國風土志叢刊》第43冊，據《適園叢稿》本影印），頁36b。

[38] 清・顧祿，《桐橋倚櫂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道光年間刊本），卷一二，〈園圃〉，頁7a-7b。

[39] 同前文，頁7b-8b。

[40] 清・顧祿撰，王邁校點，《清嘉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卷三，〈三月・穀雨三朝看牡丹〉，頁79-80。

[41] 清・袁景瀾（袁學瀾）撰，甘蘭經、吳琴校點，《吳郡歲華紀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卷三，〈三月・穀雨看牡丹〉，頁129。

[42] 清・何廣生，〈光福後竹枝詞〉，收入《歷代竹枝詞》第4冊，己編，頁3084。

[43] 清・徐傅編，王金庸補輯，光緒《光福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二十六年修民國十八年重印本影印，1983），卷一，〈風俗〉，頁18a；卷四，〈土產〉，頁2b-4a。

[44]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08冊，據明末刻清康

是京師所在，各色花卉品種更多，四季皆有鮮花上市，即使中等人家、甚至小戶的婦女，也想辦法買鮮花插在家裏以供賞玩。由於需求量大，簪戴的朵花、盆栽的成棵時花、插瓶把花等各種不同用途的花卉四時不斷，且「買者紛然」。[45] 東西馬塍在餘杭門外、羊角埂之間，「土細宜花卉，園人多工於種接，爲都城之冠」。[46] 元代陳旅 (1288-1343) 曾記：杭州「城北有村曰馬塍，居民多業藝花」。[47] 明代杭州人稱東西馬塍爲南花園，往北十餘里的板橋則稱北花園。[48] 嘉靖年間，田汝成 (1503-1557) 曾云：「山茶，馬塍之間多有之，有紅、白二種。其花有寶珠、樓子、千葉、單葉之分，有一本而接爲數色者，有早開而晚落者。」[49] 清代時，馬塍一帶仍盛栽花木。康熙年間，王晫 (1636-?)〈武林北墅竹枝詞〉云：「墅故有上花園、下花園，土人多藝花爲活」。[50] 乾隆年間，陳燦《西湖竹枝詞》也說：

> 東西馬塍在錢塘門外，土細宜花。當春時，園丁採葩叫鬻。曉鏡開奩，朱樓搴箔，千紅萬紫，都向玉人頭上嬌矣。[51]

方薰 (1736-1799) 繪圖，趙知聿、李春橋等人圖說的《太平歡樂圖》也記道：「今橐駝之技，猶相傳習，四時擔樹，鬻於城市中。兼爲人修植卉木，經其手皆欣欣向榮。馬塍之名今不著，俗呼爲花園埂。」[52] 杭州花卉除產於馬塍之外，夏

熙年間李瑂重刻本影印），卷三，頁22b-23a。

[45] 參見李春棠，《坊牆倒塌以後——宋代城市生活長卷》（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頁52-54；魏華仙，《宋代四類物品的生產和消費研究》（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頁219-220。

[46] 宋・施諤纂，淳祐《臨安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七年《武林掌故叢編》本影印，1983），卷九，〈山川・諸塢・東西馬塍〉，頁21a。

[47] 元・陳旅，《安雅堂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據抄本影印，1970），卷七，〈菌閣石記〉，頁23b。

[48]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58），卷二二，〈北山分脈城外勝蹟・衢巷河橋〉，頁276。

[49]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58），卷二四，〈委巷叢談〉，頁435。

[50] 清・王晫，〈武林北墅竹枝詞〉，收入《歷代竹枝詞》第1冊，甲編，頁473。

[51] 清・陳燦，《西湖竹枝詞》（收入《歷代竹枝詞》第2冊，丙編），頁1258。

[52] 清・方薰繪，《太平歡樂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五年重刊石印本），頁46a。道光七年 (1827)，董棨 (1772-1844) 曾據舊圖臨摹，圖記則依舊，現已影印出版；參見清・董棨繪，《太平歡樂圖》（北京：學林出版社影印，2003），圖94，〈種樹匠〉，頁189。

月荷花則來自西湖，「藝華者棹小舟採之，市於人以供瓶玩」。[53] 而在七月初，城外賣桂花者即接踵而至，大約均屬早黃品種；另有丹桂、銀桂諸品種，八月始開花，產於天竺、月輪山、西谿諸處，「步屧過之，香盈巖壑」。[54]（參見圖二）杭州城居者也常向山農購取巖谷中所生芝草，「以磁甌栽植，置之几案間，以爲珍玩」。[55] 晚清時，杭州附近的花農，也常將桂花枝剪成逾尺大小，裝於箬葉竹夾大粗筐中，挑往城中街巷叫賣，一二文錢、五六文錢不等，但因爲枝短，不能用於插瓶。[56]

上海花卉種植，在江浙諸都會中屬於後起，明代蒔花業不如其他城市。至清乾隆年間，寶山縣彭浦人趙嘉德建趙氏花園，種植花草出售，獲利不薄，附近居民羣起仿效，一時「南北中三趙宅，暨董家濱等處，田疇相望，叢翠嬌紅，疏密相間者，皆營業之花園」。道光二十三年 (1843)，西方人即見到上海縣城四郊有不少園圃，花農每天清晨採花進城售賣，生意頗爲興隆。[57] 清代上海所產花卉，以菊花與牡丹最爲有名，「藝菊家盛於石笋里」，而「法華牡丹甲四郡」。[58] 由於法華鎮李氏栽培牡丹著名，故清人有「法華李氏牡丹良，遠近人稱小洛陽」的詩句。[59] 法華牡丹之花種，相傳係盛清時李氏自洛陽攜回百餘種，植於淞溪園中，其中以紫金球、碧玉帶二種最爲名貴，「色香俱勝」；太平天國亂，淞溪園燬於兵燹，當地花農續加培育，「當春作花，肩挑市販」，但至同治末年，品種僅存十餘種而已。[60]

---

[53] 方薰繪，《太平歡樂圖》，頁23b；董棨繪，《太平歡樂圖》，圖29，〈西湖採荷花〉，頁59。

[54] 方薰繪，《太平歡樂圖》，頁33a；董棨繪，《太平歡樂圖》，圖75，〈八月賞桂花〉，頁151。

[55] 方薰繪，《太平歡樂圖》，頁11b；董棨繪，《太平歡樂圖》，圖99，〈靈芝〉，頁199。

[56] 清・佚名，《杭俗怡情碎錦》（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稿本影印，1987），〈時序類・八月〉，總頁14-15。

[57] 參見張忠民，《上海：從開發走向開放，1368-1842》（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頁52-53。

[58] 清・楊光輔著，許敏標點，《淞南樂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171。

[59] 清・秦榮光著，呂素勤標點，《上海縣竹枝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物產〉，頁104。

[60] 清・葛元煦撰，鄭祖安標點，《滬遊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一，〈法華牡丹〉，頁5-6。

除了以上幾個城市之外，江南其他城市的周邊同樣也都有花田。如江陰城外的古涇「藝花最盛」，康熙年間，陶孚尹有詩云：「花關匝匝槿籬斜，姹紫嫣紅入望賒。爭說古涇花事足，洛陽三月不須誇。」[61]

由於花卉的利潤相當可觀，穀物種植遠遠不如。晚明時，邵彌（約1592-1642）〈虎丘花市曲〉云：「虎丘山家田不辨，虎丘草木粉如霰。濕綠妖紅開未勻，塘上分花船裏見。不爭罷亞爭芳菲，一株艷絕千錢微。田頭老農常苦飢，山家日日烹鮮肥。」[62] 可見種植花卉，其收入與生活均比種田要好。乾隆四十七年(1782)，袁枚 (1716-1798) 也有詩云：「耕田辛苦讀書窮，活計年來事事空。只有種花經紀好，一生程本是春風。」[63] 基於此，蘇州周邊的花田多於種桑稻的農田。清初，顧樵 (1614-?)〈虎丘竹枝詞〉云：「桑畦盡作栽花地，那得繅絲有綺羅。」[64] 顧文鉌〈虎丘竹枝詞〉同樣指出：「四面青山耕織少，一年衣食在花開。」[65] 嘉慶年間，毛孝光 (1752-?) 描寫山塘景致，也有詩云：「東西煙瓦幾千家，不種桑麻只種花。」[66] 後來，許多農田甚至改而種花。康熙年間，邵長蘅(1637-1704)〈種花〉詩曾談道：

> 山塘映清溪，人家種花樹。清溪鴨頭清，門前虎邱路。春陽二月中，雜花千萬叢。朝賣一叢紫，夕賣一叢紅。百花百種態，牡丹大嬌貴。一株百朵花，十千甫能賣。朱門買花還，四面護紅闌。繡幕遮風日，嬌歌閒清彈。復有些子景，點綴白石盆。咫尺丘壑趣，屈蟠松檜根。買窴几案間，一盆直千鍰。老圃解種花，老農解種穀。種穀輸官租，種花豔儂目。種花食肉糜，種穀食糠麩。還復受敲朴，肉剜難為醫。嗟呀重嗟呀，老農苦奈何。呼兒賣黃犢，明年學種花。[67]

---

[61] 清・陶孚尹，《欣然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2001〕，第3冊，據清康熙五十一年陶士銓刻本影印），卷二，〈澄江竹枝詞十二首〉，頁13a。

[62] 清・顧湄纂，康熙《虎丘山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一年懷嵩堂刻本），卷四，〈物產〉，總頁387。

[63] 清・袁枚著，周本淳標校，《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詩集卷二八，〈題何春巢賣花圖〉，頁738。

[64] 清・顧樵，〈虎丘竹枝詞〉，收入《歷代竹枝詞》第1冊，乙編，頁649。

[65] 清・顧文鉌，〈虎丘竹枝詞〉，收入《江蘇竹枝詞集》，頁652。

[66] 清・毛孝光，〈前意未盡復得五首〉，收入《歷代竹枝詞》第2冊，丙編，頁1142。

[67] 清・邵長蘅，《邵子湘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7-248冊，據清康熙刻本影印），《青門賸稿》卷二，〈吳趨吟・種花〉，頁14b-15a。

詩中除談到種植情況之外，亦言及牡丹要十貫，與盆景一盆值千錢，其收益不錯，生活也過得好，故後來老農也叫兒子改種花。乾隆五十二年 (1787)，孫原湘 (1760-1829) 客寓蘇州城一月，在〈賣花家〉詩中談到：種花「先期爲珍後期寶，開在當時轉如草」，「宣州白盆一種妍，紅箋書價值十千。朱門買花爭早得，罕物不惜黃金錢」。種花生計穩，種穀收入少，「種花人家肥，種穀人家飢」，隔年稻農遂受僱於花匠家，爲其提花至市場販賣，「一籃花值金一兩，妓館遊船還倍賞」。[68] 道光年間，袁學瀾〈花市曲〉亦云：花圃「主人衣食只在花，不知布穀澆桑麻」，其中「綠盆小樹陳高案，貴客時拋三兩貫。葉經水灑根泥封，移入朱門供清玩」，詩的最後，也述及農民改業種花。[69] 以上諸詩雖暗諷種花非農本，但多述及花卉種植收益好，引發了農民轉種花卉。另外，咸豐十年 (1860)，潛庵《蘇臺竹枝詞》有詩云：「紅交紫錯成香市，似爲遊人特地開。一畝花田錢十萬，催租不見打門來。」[70] 看來種花的收益是不錯的，故不用勞動田主上門來催租。（關於種花的器具，參見圖三）

這種情況也出現在揚州一帶。道光年間，康發祥 (1788-1865)《海陵竹枝詞》曾說揚州附近的泰州，「州城內四面皆園圃，只種蔬菜以資人食，而種花處獨少，知務本也。」[71] 但至晚清則變了，朱餘庭《海陵竹枝詞》有詩云：「半郭半村新物色，課晴課雨舊生涯。年來田舍繁華甚，不種桑麻但種花。」詩註：「城中菜圃均易爲賣花處。」[72] 儲樹人《海陵竹枝詞》也有詩云：「花農終歲種花田，種出新花總賺錢。開到木香梔子候，筠籃唱賣買街前。」[73] 菜農改種花，顯然是因於種花利潤更高，另一方面也可證泰州花卉賞玩之風已起。

江南花匠園藝栽培，除花種、樹株可以自行取得之外，其他配件往往需要許多行業支援。舉例來說，清代蘇州花市花卉交易，「舉器以買者，無論千盎百盂」，缸有十浴缸、五浴缸、大尺八、中尺八、小尺八缸，以及竈缸、大扦、小扦之別。花盆則以江西碗砂爲上，礬石次之，又次則用宜興紫砂、黃砂盆，與丁

---

[68] 清・孫原湘，《天真閣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87-1488冊，據清嘉慶五年刻增修本影印），卷五，〈吳趨吟十首・賣花家〉，頁18a。

[69] 清・袁學瀾，《吳俗諷喻詩》（收入《中國風土志叢刊》第35冊，據《適園叢稿》本影印），〈花市曲〉，頁18a-b。

[70] 清・潛庵，《蘇臺竹枝詞》（收入《歷代竹枝詞》第4冊，庚編），頁3390。

[71] 清・康發祥，《海陵竹枝詞》（收入《歷代竹枝詞》第3冊，戊編），頁2423。

[72] 清・朱餘庭，《海陵竹枝詞》（收入《歷代竹枝詞》第4冊，己編），頁2891。

[73] 清・儲樹人，《海陵竹枝詞》（收入《歷代竹枝詞》第4冊，己編），頁2880。

山、蜀山兩地所出之五色澆油窯器，有大套、小套之分。最差的則是粗砂缽盂，每個才值三、四文錢而已。[74] 這些盆盎非花匠所能自行生產，故應爲長江流域的窯場帶來不少生意。至於將城市糞便運往城郊的糞夫與糞船，更與花木栽培離不開關係。如蘇州城外胥門、盤門之間的百花洲，就常有糞船出入。萬曆年間，袁宏道 (1568-1610) 有一晚從盤門出來，路上遇見江盈科 (1553-1605)，盈科問：「百花洲花盛開否，盍往觀之？」宏道回道：「無他物，惟有二、三十糞艘鱗次綺錯，氤氛數里而已矣。」盈科聽後大笑而別。[75] 歸結來說，明清江南城市園藝業之大興，靠的是各行各業的相互支援。

明清江南城市周邊的花卉栽培，有一點值得注意，即花卉栽培的專一化，常是一個村落僅栽植單種或一、二數花卉。這類的例證，如前面提到的揚州傍花村，整個村僅培植菊花，無其他雜花。又如南京嚴谷寺的梅花、雞籠山的菊花，揚州二十四橋的芍藥，與上海石笋里的菊花、法華鎮的牡丹。其他的例子，如在晚明時，沿崑山縣城往北而行，經過淮雲寺，「路徑平衍，土人結蒿爲籬落，護水仙其中，漸成深谷。寺以南，花戶多矜貴之色。」淮雲寺稍北一、二里之處，有花丁的花卉交易市集。[76] 至於清代虎丘山塘一帶，也常是各衖各村皆有其特色花卉，如長涇的古香村，「居民多藝玫瑰、木犀爲業，春闌秋半，香氣襲人眉宇」。[77] 這樣的栽植分工，可以避免各村花農之間的衝突，也有利於各村長期培植其特色花種，加強其市場的競爭力。

江南的花農與花樹業者，大多崇祀花神廟。據顧雲濤 (1790-1834) 記載，蘇州的花神廟有數處，一在桐橋內十二圖的花神濱，拜祀花果之神，建於洪武年間。一在虎丘山梅花樓，乃乾隆四十九年 (1784) 蘇州織造四德、知府胡世銓、里人陳維秀等人所建。一在管山，一在清真觀旁。以上數處，均由花果同業奉祀香火。一在定慧寺西，則絨花、象生花業者守之，舊址在齊門新橋巷，道光十六年 (1836) 移建於此。[78] 值得注意的是，蘇州在清代出現了花商公所，位置在虎

---

[74]《桐橋倚櫂錄》卷一二，〈園圃〉，頁8b-9a。

[75]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4冊，據明崇禎二年刻本影印），卷八，〈百花洲〉，頁12b。

[76] 明・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明崇禎年間刻本抄補本影印，1986），卷一四，〈水仙〉，頁1a。

[77]《桐橋倚櫂錄》卷七，〈場衖〉，頁14b, 15a, 16a。

[78] 清・顧雲濤撰，甘蘭經、吳雨窗、吳琴標點，《吳門表隱》（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卷八，頁106。

丘的花神廟，創設於乾隆年間。[79] 花卉業者組成公所，代表花卉業之組織化，有利於業者的商務協調與市場的整合，但價格是否統一、技術是否交流則不清楚。其後，花商公所曾兩度重修。虎丘花神廟初建時，地狹而小，道光四年 (1824)，董事唐啓祥勸募同業捐錢重建，廟比以前要寬大些，但因資金不足而停工，又經同業再次募集，才於道光十二年 (1832) 十二月修竣。在這年所立的〈重修花商公所捐款收支碑〉中，除三山花幫、長樂花幫及景隆寶號、寶元寶號、吳德凝寶號、止足堂、珊茂堂等商號外，捐款具名者主要是個人，其中應該大部份是花肆與花圃業者。[80] 至光緒三十九年 (1893)，花神廟再次重修，據所立〈重修花商公所捐款收支碑〉記載，捐款者具名主要是店號，其中有花肆、茶行、秤號、園圃業者，捐款名單及金額如下表：[81]

捐款金額	捐款之花肆、茶行、秤號、園圃
洋拾五元	東粵高荷天
洋拾元	方怡盛號、東粵陳樂軒、閩省福新興、郁子良園、馮士珍園、周耀祥園
洋七元	顧秋泉園
洋陸元	顧鴻記園
洋五元	恒興公號、郁恒懋號、源發合號、廣興源號、興隆昌號、隆盛和號、同慶長號、大德興號、謙升東號、雙盛號、永興長號、人和享號、德興昌號、慶發和號、寶善堂號、同興魁號、義順華號、怡和茶行、郁恒懋秤、顧禮耕秤、周柏茂秤、徐森茂秤、余保如秤、張春記秤、徐駕明園、李松亭園、顧仁渠園
洋四元	黃鳳祥園、顧仁愷園、顧榮貴園、顧鶴亭園
洋三元	顧永成秤、張春庭園、王吟濤園、吳耀峰園、徐耀章園、吳啓賢園。俞錦芳園、俞春山園合捐洋三元
洋貳元	公正茶行、蔡記茶行、誠泰茶行、震昌茶行、廣順茶行、泰記茶行、復春茶行、同興茂秤、恒錦茂秤、吳雲慶園、李勝祥園、徐庭

[79] 江蘇省博物館編，《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59），頁418。

[80] 同前書，頁418-420。

[81] 同前書，頁420-422。

捐款金額	捐款之花肆、茶行、秤號、園圃
	章園、凌耀庭園、項萬方園、羅建章園、陳玉山園、唐壽觀園、羅金龍園、朱鳳山園、朱洪山園、時永發園、戈金和園、金大狗園
洋壹元	徐瑞章園、周金福園、羅保清園、俞清和園、蔡萬興園、高鳳山園、時永福園、周耀興園、陳永福園、羅春和園、羅啓龍園、楊寶林園、陳啓發園、顧永祥園、周瑞春園、吳金富園、吳星記園、唐柳村園、唐雲福園、陸元慶園、嚴百生園、陳士明園、丁巧福園、顧元林園、顧憲祥園、吳銀福園、唐廷鈺園、黃小弟園、錢招生園、錢毛觀園、吳惠文園、張友卿園、奚錦奎園、張德觀園、項金龍園、金三福園、朱聚福園、吳四壽園、馮錦堂園、馮松泉園、馮德福園、徐鶴山園、時雲亭園、蔡洪發園、俞元春園、曹雙寶園、潘增元園

以上所列，計花樹店十八家、茶行八家、秤號九家、園圃八十家，另有廣東、福建三個商號應捐，應該是進口閩、廣花卉的商家。在以上所列之外，捐助銅錢者未具名，故這些名單應非花卉業者的總數。花肆、園圃業者理當出資修廟（公所），而秤號因花卉買賣必須過秤，也在公所募捐之列；至於茶行，則可能即在花市附近，交易雙方或在茶行交易，或在店內休憩啜茗，與花卉業有所關聯，亦出錢共襄盛舉。整體而言，花肆樂捐的金額較高，園圃業者則較低，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前者是商家，後者主要是花農，利潤相對而言還是沒有商家高。除了蘇州之外，上海花樹業者在光緒十七年 (1891)，亦於花神廟成立花樹業公所，由司年輪值經理。[82]

塘花復興

明清江南城市花卉種植，另有一事亦值得注意，即塘花（俗稱唐花）法之復興。中國以暖窖栽培蔬果始見於漢代，[83] 唐代時這種技術已應用於培植花木，[84]

[82] 吳馨等修纂，民國《上海縣續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七年刻本影印，1970），卷三，〈建置下・會館公所〉，頁12a-b。

[83] 漢・班固著，傅東華等點校，《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八九，〈循吏傳・召信臣〉，頁3642。

[84] 參見唐啟寧，《中國農史稿》（北京：農業出版社，1985），頁730。

至南宋則此法大興。當時，臨安做爲政治中心，宮廷與貴戚、達官等對花卉的需求甚大，而一年四季以冬日最乏鮮花，鮮花的價格亦最高。城郊的花農爲博得更高利潤，遂以塘花之法提早花期，供應上階層的需求。南宋末年，周密 (1232-1298) 回憶道：「馬塍藝花如藝粟，橐駝之技名天下」，「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或作塘」。周密曾在東西馬塍住過許久，親聞老圃談及方法如下：「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縕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少候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盛春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牡丹、梅花、桃花之類，無不用此方法。[85] 元代以後，杭州不再是京師，極端奢侈的塘花需求大減，這種技術漸漸不用。由於塘花要投入較大資金，照顧人力與精力亦較一般花卉高，故其價格高得嚇人。如明萬曆年間，北京塘花所培育的牡丹，一株要銀子十多兩，蓋以難得爲貴。[86] 這樣的價格與其客源，大概僅能存在於皇戚勳貴及達官豪富聚集的京師。由此可見，塘花之法乃隨著政治中心而轉移。清代北京花農，猶沿襲這一可讓花期提早的技術。[87]

爲了讓不耐寒的花木過冬，明代江南已經存在藏花之法。萬曆初年，嘉定張應文 (1535-1593) 談蘭花栽培，言霜降後須移入室，立冬以後緊閉門戶，冬至以後則用紙糊竹籠，將蘭花藏於其中，遇太陽光大之日，揭開竹籠曝曬，每數日轉換方向，令其四面皆受日光；次年清明後方可開門，穀雨以後始可移出戶外。[88] 高濂 (1573-1620) 記茉莉花，亦云其難以過冬，若天色作寒，須移置南向窗下，令其每日向陽；或於朝南屋內泥地挖掘淺坑，將花缸放下，與地面平齊，上面以篾籠罩住，罩口旁用泥築實，令其無縫隙通風。至隔年立夏之前，方可揭去罩籠。[89] 萬曆年間，周文華記養水仙法，也提到霜降後，須搭棚遮護霜雪，「仍留南向小戶以進日色」。[90] 清康熙年間，陳淏子 (1612-?) 記到真珠蘭「性宜陰

---

[85] 宋・周密撰，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一六，〈馬塍藝花〉，頁304-305。

[86] 明・謝肇淛撰，印曉峰點校，《五雜俎》（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卷一〇，〈物部二〉，頁207。

[87] 參見王賽時，〈明清時期北京的花卉業〉，頁32-33。

[88] 明・張應文，《羅鍾齋蘭譜》（收入《美術叢書》〔上海：神州國光社，1928〕，四集第十輯第139冊），〈封植〉，頁341。

[89] 明・高濂，《雅尚齋遵生八牋》（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61冊，據明萬曆十九年自刻本縮印），卷一六，〈燕閑清賞牋下・四時花紀・茉莉花〉，頁14b-15a。

[90] 明・周文華，《汝南圃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81冊，據明萬曆四十八

濕，又最畏寒，霜降後須同建蘭、茉莉一樣入窖收藏」；茉莉在「霜降後須藏暖處，清明後方可出」；玉簪在十月中，一樣須「藏向陽室內」。[91] 曹溶 (1613-1685) 記茉莉時更談到：「聞吳中有隱者，每至秋後，輒從人家收買殘枝，開畦列種，結茅爲棚，以蔽風雪，遇有日色，開簾曬之」；並蓄養鴨子千頭，夜宿於棚下，「花根襲煖，糞復壅之，來年花發，其息十倍」。[92] 以上這些方法，主要係用土窖或棚遮方式，以避免花株受到寒害凍死，未見用火薰蒸之法。至於蘭蕙，則已有花匠爲取利，「多置浴室，取煖促開」。[93] 不過，塘花法還不太普遍。

至乾隆年間，揚州已出現塘花法。乾隆四十九年 (1784)，王芑孫 (1755-1817) 曾云：「牡丹出溫窖中者，花盡輒夭。頃於淮南見一枝，流入錢賈家。」其〈弔花行〉有云：「京師花窖法南來，魏紫姚黃犯臘開。餉歲探春都詫絕，寧知紅凍向塵埃。」[94] 則塘花法之引入應早於此。又據乾隆末年《揚州畫舫錄》記載：草河一帶湖上園亭，皆有花園，爲蒔花之地。冬季時，花匠於煖室烘出芍藥、牡丹，以備正月園亭之用。[95] 由此看來，此一技術已相當純熟。而在開春時，塘花自是重要的應景花卉。道光十年 (1830)，姜長卿《崇川竹枝詞一百首》詩註云：「綠素茸針與檜相似，而翠色欲滴，作盆玩甚佳，元宵節陳設郡廟。又有唐花牡丹最爲奇麗。」[96] 晚清惺庵居士亦有詞云：「揚州好，除夕樂銜杯。爆竹聲喧千戶接，唐花景麗一時開。避債有高臺。」[97] 孔慶鎔 (1871-1932)《揚州竹枝詞》又云：「紙窗竹屋閱年華，短巷鼕鼕臘鼓撾。銅價高昂花值賤，蓬門瓶亦插唐花。」[98] 其後，揚州東邊的泰州，花匠也使用塘花法培植花卉。道光年

年書帶齋刻本影印），卷九，〈草本花部上・蘭、水仙〉，頁8a-b, 36a。

[91] 清・陳淏子輯，伊欽恒校注，《花鏡》（北京：農業出版社，1993），卷五，〈藤蔓類攷〉，頁247, 249, 287。

[92] 清・曹溶，《倦圃蒔植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82冊，據清抄本影印），卷中，〈花卉二・茉莉〉，頁8a。

[93] 同前書，卷上，〈花卉一・蘭蕙〉，頁4b。

[94] 清・王芑孫，《淵雅堂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80-1481冊，據清嘉慶年間刻本影印），《淵雅堂編年詩稿》卷五，〈弔花行有序〉，頁4b-5a。

[95]《揚州畫舫錄》卷二，〈草河錄下〉，頁35。

[96] 清・姜長卿，《崇川竹枝詞一百首》（收入《歷代竹枝詞》第3冊，戊編），頁2190。

[97] 清・惺庵居士，《望江南百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民國陳恆和輯《揚州叢刻》本），頁4a。

[98] 清・孔慶鎔，《揚州竹枝詞》（收入《歷代竹枝詞》第4冊，庚編），頁3379。

間，康發祥《海陵竹枝詞》有詩云：「萬家園子在西城，種得花枝照眼明。恆爾寒天冰雪裏，唐花烘見牡丹生。」詩註：「萬園向來種菜，只種菊花，後來各色花枝都有，今則殘臘有牡丹、玉蘭盆景矣，蓋習于火烘法也。」[99]

蘇州出現塘花法，也在乾隆年間。據乾隆四十九年徐嵩所撰〈花神廟記〉記載，乾隆四十五年 (1780) 春，清高宗第五次南巡至蘇州，「臺使者檄取唐花備進，吳市莫測其術」，郡人陳維秀善植花木，仿北京窖窖薰花之法爲之，春花因是大盛，得以達成任務。乾隆四十九年，清高宗第六次南巡時，亦依此例進呈唐花，「繁葩異艷，四時花果，靡不爭奇吐馥，群效靈于一月之前，以奉宸游」。[100] 這一記載，與道光年間《吳郡歲華紀麗》所載不同：

> 窖花始於馬塍，亦名唐花。康熙初，山塘陳維秀始得窖薰之法，臘月中能發非時之品，如牡丹、碧桃、玉蘭、梅花、水仙之類，鮮艷奪目，供居人新年陳設之需。[101]

道光年間《吳門表隱》所載亦同。[102] 然而，若陳維秀得之於康熙初年，則其在乾隆末年，年齡已超過一百二十歲，《吳郡歲華紀麗》與《吳門表隱》之記載顯然有誤。推想起來，應該是陳維秀得此法在前，當官府要求進呈塘花時，陳氏可以馬上支應。故陳維秀習此法之時間，或許在乾隆中葉或初年。而經由清高宗下江南之助長，塘花遂成爲蘇州元旦應景的商品。乾隆五十九年 (1794)，祝德麟 (1742-1798)〈虎邱絕句八首〉詠道：「地爐烘出牡丹芽，三月春光頃刻賒。却與寒梅並羅列，真花不愛愛唐花。」[103] 又，尤維熊 (1762-1809)〈虎邱新竹枝詞八首〉有詩云：「花市人家學種蘭，春蘭未發臘梅殘。試燈風裏唐花早，烘出一叢紅牡丹。」另一首詠道：「花神廟裏賽花神，未到花時花事新。不是此中偏放早，布金地煖易爲春。」[104] 據嘉慶十八年 (1813)《吳門畫舫續錄》記載：

---

[99] 康發祥，《海陵竹枝詞》（收入《歷代竹枝詞》第3冊，戊編），頁2427。

[100]《桐橋倚櫂錄》卷三，〈寺院〉，頁8a-b。

[101]《吳郡歲華紀麗》卷一一，〈十一月・窖花〉，頁323。

[102]《吳門表隱》卷末，〈附集〉，頁354。

[103] 清・祝德麟，《悅親樓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62-1463冊，據清嘉慶二年姑蘇刻本影印），卷二七，〈虎邱絕句八首〉，頁6a-b。

[104] 清・尤維熊，〈虎邱新竹枝詞八首〉，收入《歷代竹枝詞》第2冊，丙編，頁1490, 1491。

> 山塘列肆，半開花窖，烘諸花，能令先時開放，謂之唐花，比京師唐花較美。惟牡丹最易烘而葉難發，越新年，取花葉全美者，種以磁盆，售善價。[105]

道光年間《桐橋倚櫂錄》亦云：虎丘花農於嚴冬設置窖室，謂之開窖；窖中晝夜爐火不斷，專門溫烘碧桃、玉蘭、水仙、蘭蕙、迎春、郁李、五色牡丹，以備士商、衙署迎接新年玩賞之用，俗呼爲窖花。又有屋子安置畏寒花樹，室內的窗縫糊紙，可使溫氣不洩漏，謂之花房。在春分之後，各種花卉移出花房，必須覆蓋蘆簾，「以避風日」。[106] 由於花卉提早在春節前盛開，爲佳節增添喜氣，價格並不便宜，花農亦可獲得厚利。不過，隨著花園子塘花栽培日多，後來價格日漸下降。嘉慶年間，蔡雲 (1764-1824)《吳歈百絕》云：「往時唐花甚珍貴，今則視同常品，特較他卉價昂耳。」[107] 吳兆鈺《姑蘇竹枝詞一百首》就有詩述及此：「觀西人日春如海，姹紫嫣紅擔道旁。賤買一叢地窖出，明窗裝點只尋常。」[108] 即使如此，花農還是持續培植塘花以供應春節需求。咸豐年間，李雲棟〈山塘竹枝詞〉云：「嫗蕊冰恣雪未融，暖房烘出玉玲瓏。小娃顏侶無情惱，尐近唐花也自紅。」[109]

晚清上海花匠也運用此種技術催促花期。道光年間，張春華《滬城歲事衢歌》云：春花如紅梅、水仙、牡丹之類，臘月原未能開花，「灌園者爲密室，列花於中，爇炭溫之，毋壯熱，一室中融融然有春氣，數日後即放苞矣」。[110] 光緒三十二年 (1906)，頤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卷三〈烘花花園〉詩云：「願花開早故烘花，應候流香未足誇。一樣鮮妍葩盡放，爭先獲利售人家。」[111] 附帶一提的是，隨著西方玻璃的大量輸入，晚清上海出現了玻璃花房。光緒十九年 (1893)，池志澂 (1854-1937) 說上海張園中的外國花卉甚多，「多則藏玻璃室

---

[105] 清・箇中生，《吳門畫舫續錄》（收入朱劍芒編，《章臺紀勝名著叢刊》〔上海：世界書局，1936〕，第8種），頁16。

[106]《桐橋倚櫂錄》卷一二，〈園圃〉，頁9a。

[107] 清・蔡雲，《吳歈百絕》（收入《歷代竹枝詞》第4冊，己編），頁2971。

[108] 清・吳兆鈺，《姑蘇竹枝詞一百首》（收入《歷代竹枝詞》第5冊，辛編），頁3970。

[109] 清・李雲棟，〈山塘竹枝詞〉，收入《歷代竹枝詞》第4冊，己編，頁2630。

[110] 清・張春華，《滬城歲事衢歌》（收入《中國風土志叢刊》第43冊，據民國《上海掌故叢書》本影印），頁20a。

[111] 清・頤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收入顧秉權編，《上海洋場竹枝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150。

中」。[112] 頤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卷一〈玻璃護花高屋〉詩也詠道：「玻璃高屋設橋邊，保護群花異樣鮮。大雨無妨風不入，祇留溫暖日光穿。」[113] 相較於傳統的花房，玻璃花房在保溫與日照上面毋寧是比較好的，但其成本高，普及性不高。

綜合以上所述，大約在乾隆中葉以後，塘花技術已在江南花農之間傳播。而即使皇帝不再南巡，但基於上階層的消費需求，塘花之法一直延續下來，其缺點則是花容易凋萎。嘉道年間，顧元熙〈唐花賦〉序云：「南方窖花，牡丹爲盛。北方地寒，梅亦不花。花者，皆唐花也。早開而無香，且易悴。」[114]

二・能手巧匠與技術變革

據農史學者指出：明清在花卉栽培技術與知識傳播上有重大進步，出版了相當多的專業花卉譜錄，而農書中對花卉栽培法亦多所記載。[115] 但園藝栽培技術，並不一定呈現直線發展，且擁有文人撰述的花卉栽培指南，未必即能栽出精品，許多特別的祕訣，仍存在於花匠腦中，不輕易外授，有時所傳非人，可能導致技術失傳。或遇上戰亂，原來的技術可能中斷，前面提到的上海李園牡丹就是一例。又如清初無錫的牡丹，原以西鄉許氏莊最盛，人稱爲「許牡丹」。嘉慶年間，惠山塘附近的九峯庵老僧，以銀十兩買得牡丹一株，植於庵庭之中，精心加以培育，並募捐做成帷幕、欄杆。初時開花百餘朵，後年至三百朵，故每當花季時，「傾城往觀」，牡丹之名遂蓋過許氏莊。[116] 可見在江南，很難有花園能持續具備領先優勢，常在競爭之中就被超越。這種情況，自然也存在於專業栽培花卉的花匠上面。

---

[112] 清・池志澂著，胡珠生標點，《滬游夢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162。

[113]《滬江商業市景詞》（收入《上海洋場竹枝詞》），頁98。

[114] 清・陸以湉撰，崔凡芝點校，《冷廬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二，〈顧侍讀〉，頁92-93。

[115] 參見葉靜淵，〈我國明清時期的花卉栽培〉，頁308-315；南京農業大學等編著，《太湖地區農業史稿》，頁316-321；舒迎瀾，《古代花卉》，頁21-23；魏露苓，〈明清植物譜錄中的農林園藝技術〉，《農業考古》1996.3：228-234, 238。

[116] 清・張雲璈，《簡松草堂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71冊，據清道光年間《三影閣叢書》本影印），卷六，〈無錫九峯庵牡丹記〉，頁8a-b。

技術競爭

歷代以來，對於專業種植花卉者，各地稱呼有所不同。據唐代柳宗元 (773-819) 記載，長安城西豐樂鄉郭橐駝善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早實以蕃。他植者雖窺視傚慕，莫能如也」。[117]（參見圖四）故後來「橐駝」成了善種花木者之別稱。又據《龍城錄》記載，洛陽人宋單父，善於種植花木，「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鬪色，人亦不能知其術」；唐玄宗召其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呼爲花師，亦幻世之絕藝也」。[118] 直至清末，「揚州風俗，喜稱服役花草之人名曰花師」。[119] 明清蘇州則通稱栽植花木之人爲花園子，已見於前舉黃省曾的《吳風錄》、顧祿《桐橋倚櫂錄》等書。此外，文人詩文中或稱養花人，或稱花丁、花匠或種樹匠。

明清江南城市花卉賞玩與栽植之盛，連帶也使花木栽培技術有所提昇。在花卉盛開的季節，花農爲吸引遊客前來觀賞，進而購買其所要的花卉，送回家中擺放或饋贈他人，無不積極培植稀奇品種，以賺取更大利潤。因此，出現了許多栽花名家。明代中葉，蘇州吳江顧氏就擅長培植菊花，汝泰住處與其相鄰，曾邀約同邑友人史鑑 (1434-1496) 齊往觀賞。成化二十三年 (1487) 十月，史鑑始克赴約，顧氏見有雅客到，甚是歡喜，在花田中以酒酌觴，不久所辦食饌亦至，「相與對花樂飲」。主人以當日風大，花朵及花葉俱不佳，邀其下次再來。次年九月，史鑑家中火災，不克前往。弘治二年 (1489) 十月，汝泰考中舉人，準備上京趕考，史鑑前往道別，見顧家菊園花正盛開，於是入園遍覽，總計黃者十八種、白者十一種、紅者十二種、紫者七種又最佳，因是撰〈菊花記〉誌之。[120]

隨著名家栽培益精，市面上奇種競出。嘉靖年間，田汝成談到菊花時曾云：「近日杭州品色甚多，有千葉、大紅、黃鈐、深紫、雙絞、純白、茸絲、鵝黃、

---

[117]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9），卷一七，〈種樹郭橐駝傳〉，頁473。

[118] 唐・柳宗元，《河東先生龍城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八編》〔臺北：新興書局，1975〕，第1冊），卷下，〈宋單父種牡丹〉，頁6a。

[119] 清・劉聲木撰，劉篤齡點校，《萇楚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三筆》卷六，〈花師〉，頁117。

[120] 明・史鑑，《西村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259冊），卷七，〈菊花記〉，頁23b-26b。

二色銀臺者。」[121] 萬曆《杭州府志》也說菊花有黃、白、紅、紫數種，其名品甚多，不勝枚舉，又有五月開者，稱爲「五菊」。該書又提到：「近日土人好事，或菴蔄接菊于上，則花之小者便能使之大。又各菊相雜互接，則黃者間白，白者間紅，參錯可愛，然太鑿天巧矣。」[122] 萬曆年間，王世懋 (1536-1588) 指出：

> 菊至江陰、上海、吾州而變態極矣。有長丈許者，有大如盌者，有作異色、二色者，而皆名粗種。其最貴，乃各色剪絨、各色撞、各色西施、各色狼牙，乃謂之細種，種之最難，……[123]

可見當時江南栽培菊花，以江陰、上海、太倉州最爲有名。明朝末年，上海泖西沈介石就善於栽培菊花。沈氏嘗自言：「予性嗜菊，自少至老，朝斯夕斯，行止坐臥，惟菊是知，與此花作五十年交矣。」一生培育出菊花四百多種，「其滋培灌溉，另有妙法，故花亦迥出尋常」。崇禎三年 (1630)，吳履震親往造訪，見園中「五色燦爛，瓊瑤奪目，不啻身遊丹宮絳闕中」，其中有一種花朵大如碟子，而由中間分開爲兩色，黃白各半，奇絕可愛。履震問：「此果原種耶？抑造作所致乎？」介石云：「嗜久成癖，癖久而與花神遇，此呈奇獻巧者，殆神爲之耳。」著有《菊花品評》，兼附栽培之法。[124] 沈氏一生投注於栽培單種花卉，不斷研究出新奇的品種，雖說與其嗜好有關，卻可與江南尚奇之風相銜接，提供花卉市場之需求。

晚明崑山也有一些栽植花木的名家。萬曆四十三年 (1615) 十月十五日，李日華 (1565-1635) 在友人沈翠水的書齋，就遇見崑山人王仲舉，「精橐駝之術，植樹、桌石，咸有位置」。[125] 崑山傅家則善於栽培蘭花等花卉。張大復 (1554-1630) 曾說：江南春蘭出於宜興陽羨山，又名興蘭，當地人整叢掘移者，久而芬茂；以枝栽植者，則活不到隔年。一般的理解是：「氣聚而根不傷，散而失其

---

[121]《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四，〈委巷叢談〉，頁436。

[122] 明・陳善等修，萬曆《杭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明萬曆七年刊本影印，1983），卷三二，〈土產〉，頁8a。

[123] 明・王世懋，《學圃雜疏》（收入《寶顏堂祕笈》〔臺北：藝文印書館據明萬曆年間繡水沈氏尚白原齋刻本影印，1965〕，第17函），頁12a。

[124] 清・吳履震，《五茸志逸》（上海：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標點本，1963），卷三，頁159。

[125] 明・李日華著，屠友祥校註，《味水軒日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卷七，萬曆四十三年十月十五日條，頁492。

故」，但南郭的傅家蘭，即使以枝栽植，卻可保存十多年，「花葉競爽」。里人趙氏曾偷偷學下栽法，果然應驗；但他卻不行，「用之輒敗」。[126] 張大復爲蘇州崑山人，其所提到的傅家，應是當地善於培養花卉的專家，下面將再提到。

爲了供應更好的品種，或提高購買者的意願，像吳江顧氏、上海沈氏、崑山傅家這種養花人應不在少數。張大復即曾說：「薔薇花最古，美而艷。三十年來，種類競異，至於今，麗極矣。」[127] 足見江南玫瑰之栽植，在萬曆年間有重大發展。而原本以揚州爲盛的芍藥，在南京附近的白山、蔣山、茅山也有栽培，晚明時亦育出若干好的品種，有一種叫蓮香白，「初淡紅，後純白，香如蓮花」。[128] 至清朝初年，芍藥「四方競尙，俱有美種佳花」，[129] 原因應在於栽培法的傳播。康熙二十九年 (1690)，高士奇 (1642-1704) 曾說：「芍藥之種，古推揚州，今以京師豐臺爲盛。浙中雖無佳種，惟培溉有方，花亦頗大。」[130] 又據王應奎 (1683-1760?) 記載，其家鄉常熟縣文村的季家，所種海棠與他人不同，花朶大而且密，俗有「季家海棠十八瓣」之稱。因此，白隄賣海棠花者，常在海棠上標示是「文村種」三字。[131] 乾隆年間，蘇州王氏壑舟園中，有古白山茶一棵，「吳越間，種皆出此，謂之王園白」，一栽之價，值銀五錢，「利之所在，剪伐無已」，王家乃作圍欄加以保護。[132] 而在咸豐年間，蘇州嘉定的天竹，以方亭浦沈士豐家所產者最佳，俗稱狐狸尾，「子粗而密，枝軟而長，蘇人每以名卉易之」。[133]

實際上，栽植江南以外花木的利潤更高，故投入種植者不少。嘉靖年間，田汝成談到：蘭花莖葉肥大而翠勁可愛者，都由福建、廣東運來，價格極貴，非富

---

[126]《梅花草堂筆談》卷六，〈春蘭〉，頁19b。

[127] 同前書，卷六，〈薔薇〉，頁16a。

[128] 明・王象晉，《二如亭群芳譜》（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2001〕，第80冊，據明末刻本影印），《花譜》卷四，〈芍藥〉，頁1b。

[129]《花鏡》卷六，〈花草類攷・芍藥〉，頁305-306。

[130] 清・高士奇，《北墅抱瓮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82冊，據清康熙年間刻本影印），頁11b。

[131] 清・王應奎撰，王彬、嚴英俊點校，《柳南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六，頁117。

[132]《淵雅堂全集・淵雅堂編年詩稿》卷一八，〈壑舟園雜述十首〉，頁16b。

[133] 清・沈葵增修，咸豐《紫隄村志》（上海：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標點本，1961），卷二，〈土產〉，頁68。

貴之家不能得。但自嘉靖以來，「滿城皆植，而市廛中亦有擔荷而鬻之者」。[134] 這當中可能有花匠專事栽培，故蘭花上市者甚多。萬曆《杭州府志》也說：「茉莉來自嶺南，數年前種尚少，近日頗繁盛矣。」[135] 異地花卉之大量上市，實與栽培技術日新月異有關。如萬曆年間，崑山傅家舊有石巖花六株，傅君種植數年，每年花開，鮮艷奪目。萬曆十八年 (1590)，王世貞 (1526-1590) 以南京刑部尚書致仕歸田，賣田數十畝，買得這些石巖花，藏置於小樓之下，用雲母石紙裝飾藏室四壁，「花光浮昱，都作映紅寶色」。至萬曆末年，賣花者多能買到，故絕不聞有如王氏之愛好者。此花原產於溫州、台州之間，江陰人「接植頗繁，三、四停輒售，售輒萎，而花故不逮溫、台」。[136] 另外，天啓元年 (1621) 梓行的《二如亭群芳譜》，也記到鎮江、丹陽花匠栽植原產於湖廣零陵的蕙草（一名黃零香）。[137]

這些花匠從各處搜羅奇花異木，並想盡辦法加以栽培，爲的是讓欲購者觀賞選取。萬曆二十七年 (1599) 九月十四日，馮夢禎 (1548-1605) 在蘇州造訪一處花園子，一范姓花匠引導其看園卉，曾見白山茶怒放，又見到來自雲南的白鴿花，花蕊如珠，十月初才開花，花匠視爲珍寶，大棵的要銀子二、三兩。[138] 清代江南花農爲了取利，仍多栽培異地花卉。乾隆四十年 (1775)，黃霆《松江竹枝詞》云：「珠蘭、茉莉非松產，近時花傭植以射利，向晚養磁盆內出市，香氣襲人。」[139] 石韞玉 (1756-1837)〈山塘種花人歌〉亦云：

> 江南三月花如煙，菰花人家花裏眠。翠竹織籬門一扇，紅裳入市花雙鬟。山家築舍環山寺，一角青山藏寺裏。試劍陂前石髮青，談精臺下巖花紫。花田種花號花農，春蘭秋菊羅千叢。黃瓷斗中沙的皪，白石盆裏山玲瓏。山農購花尚可種，種種奇花盛篋籠。貝多羅樹傳天竺，優鉢曇花出蠻洞。司花有女賣花郎，千錢一花花價昂。錫花乞得先生冊，醫花世傳不死方。雙雙夫婦花房宿，修成花史花陰讀。松下新泥種菊秧，月

[134]《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四，〈委巷叢談〉，頁435。
[135] 萬曆《杭州府志》卷三二，〈土產〉，頁8a。
[136]《梅花草堂筆談》卷五，〈石巖花〉，頁13b-14a。
[137]《二如亭群芳譜・花譜》卷三，〈蘭〉，頁28a。
[138]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64-165冊，據明萬曆四十四年刻本影印），卷五七，〈快雪堂日記・己亥〉，九月十四日條，頁42a-b。
[139] 清・黃霆，《松江竹枝詞》（收入《歷代竹枝詞》第2冊，丙編），頁1323。

中艷服栽鶯粟。花下老人號花隱，愛花直以花為命。譜葯年年改舊名，菉蘭月月頒新令。桃花水暖泛清波，載花之舟輕如梭。山日未上張青蓋，湖雨欲來披綠簑。城中富人好遊冶，年年載酒行花下。青衫白帢少年郎，看花不是種花者。[140]

這首詩除了談到花農與花田之外，也述及盆景及所用的盆器，與花農種植許多奇花異卉，且有栽培手冊與治蟲害的祕方。花農培植的芍藥與蘭花，品種日新月異，各色花卉透過水路運輸，運至城市販賣。在花開時節，城中富人往往帶著酒食至花田賞玩。花農藉由提供賞花的環境，也是一個增加出售機會的手段，從而可以將其新品種推銷出去。另外，有些花農在花季時，也會致送名片予名士，請其前往觀賞以達到宣傳促銷的效果。乾隆四十三年 (1778)，袁枚就曾收到南京李姓蒔花人致送的通家帖，有詩詠道：「折花使者遞名箋，知道通家見有緣。」[141]

明清江南牡丹之栽培，呈現出城市間栽培技術消長與彼此競爭的情況。江南自五代錢氏以來，迄至宋、元盛世，風俗習於繁華，「富貴之家，於樓前種樹，接各色牡丹於其杪。花時登樓賞翫，近在欄檻間，名樓子牡丹」。[142] 南宋時，江南牡丹之種植以蘇州爲盛，元初陸友仁回憶道：「吳中花木不可殫述，而獨牡丹、芍藥爲好尚之最，而牡丹尤貴重」，南宋諸王府邸皆廣種牡丹，若干官紳亦有此愛好，如提刑藍叔成家中有牡丹三千株，號稱萬花堂，他曾自洛陽移回名品數種，如玉盌白、景雲紅、瑞雲紅、勝雲紅、玉間金之類；其次，如知府林得之有牡丹千株，給事中胡長文、太尉成居仁、待制吳謙之，種花亦不下林氏；另外，史志道有五百株，畢希文、韋俊心等，多則數百株，少亦不下一、二百株。[143] 至明代，據正德《松江府志》記載：「牡丹自宋來盛於吳下，吾鄉則國初曹明仲所譜十五品最奇，並家傳洛京舊種，其名多見歐《譜》。近歲人家所植，唯壽安、樓子二、三種，深紅已爲難得，餘不復見矣。」[144] 可見上海在明初曾是牡丹的重要栽培地，但至正德年間已大不如前。又據嘉靖《吳邑志》記載：蘇州人

---

[140] 清・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66冊，據清寫刻獨學廬全稿影印），《雲留舊草》，〈山塘種花人歌〉，頁13a-b。

[141] 《小倉山房詩文集・詩集》卷二五，〈尹三公子璞齋觀察蕪湖相晤白門喜而有贈〉，頁625。

[142] 明・陸容撰，佚之點校，《菽園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一二，頁152。

[143] 元・陸友仁，《吳中舊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0冊），頁19a-b。

[144] 明・陳威、顧清纂修，正德《松江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第5-6冊，據明正德九年刊本影印），卷五，〈土產〉，頁9b。

家亭館雖種牡丹，但多爲粉紅色的玉樓春，少有紅色、紫色者，即白色亦難得。[145] 萬曆年間，周文華又云：蘇州除玉樓春外，僅有壽安、紅平頭、紫寶樓臺等品種，其中紫寶樓臺尤爲富麗可觀，但較之書傳所記，已經百不及一，而栽接、培壅之法亦已失傳。[146] 而在蘇、松牡丹栽培日漸没落時，據王世懋說：「牡丹本出中州，江陰人能以芍藥根接之，今遂繁滋，百種幻出」，其中如綠蝴蝶、大紅獅頭、舞青霓、尺素，最難得開；南京牡丹不如江陰，獨有一品種叫西瓜瓤者被視爲絕品。[147] 可見江陰已成爲江南栽培牡丹的新中心。又，萬曆年間，謝肇淛 (1567-1624) 嘗說牡丹在福建以北處處有之，山東、河南尤多，但北方品種無高大者，長至三尺即止；其在嘉興、吳江所見，則有高丈餘者，開花至三、五百朵，爲北方所未有。他覺得此花在唐宋之時莫盛於洛陽，「今則徒多而無奇，豈亦氣運有時而盛衰耶？」[148]

至清代，牡丹栽培的中心又有轉移。嘉慶年間，黃凱鈞 (1752-1820) 曾說：「近時松江地名法花，將名種牡丹，扡於芍藥根下，便生蓓蕾，雖姚黃、魏紫亦不甚難得。」[149] 嘉慶十四年 (1809)，計楠 (1760-1834)《牡丹譜》亦云：

> 古稱牡丹，洛陽為天下第一，今盛於亳州、曹州，近地洞庭山亦多佳種，松江地名法華，能以芍藥根接上品細種，牡丹愈接愈佳，百種幻化，其種易蕃，其色更豔，遂冠一時。[150]

書中列載天下牡丹名種，法華有四十七種、亳州有二十四種、曹州有十九種、洞庭山有八種、平望程氏有五種，[151] 上海又成爲江南牡丹的栽培中心。其中，以李氏淞溪園最爲有名。錢泳 (1759-1844) 曾云：「淞溪園在法華鎮，亦邑人李氏別業。法華故多牡丹，爲東吳之冠，而園中所植者尤蕃茂。」[152] 其所栽培品

---

145 明・蘇祐、楊循吉纂修，嘉靖《吳邑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10冊，據明嘉靖年間刊本鈔補本影印），卷一四，〈土產〉，頁7b-8a。

146《汝南圃史》卷六，〈木本花部上・牡丹〉，頁17b-18a。

147《學圃雜疏》，頁4b。

148《五雜俎》卷一〇，〈物部二〉，頁203。

149 清・黃凱鈞，《遣睡雜言》（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陸輯第20冊，據清嘉慶二十年友漁齋刻本影印），卷六，〈千金買蔥〉，頁11a-b。

150 清・計楠，《牡丹譜》（收入《昭代叢書》〔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三年吳江沈氏世楷堂刊本〕，辛集卷四七），頁9a-b。

151 同前書，頁3a-9a。

152 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二〇，〈園林・淞溪園〉，頁538。

種，有支紅孟白、火輪寶珠、西奇雪塔、粉磬玉兔、紫球蕊珠、毡藍潑墨、綠蝶香雪、墨球佛座、蓮範陽紅、瑞綠蟬、雉頭裘、紫羅襴、萬山雪、寒潭月、霞光射斗、十二連城、太真晚妝、金星雪浪諸品，其如苧羅妝、瑤池春等品種，即舊譜所載之醉楊妃，色香更勝。[153] 可惜此園在太平天國之亂遭受摧殘，牡丹品種亦大量失傳。淞溪園燬後，毛祥麟 (1815-?) 曾說：「今園雖廢，而是處居人，猶多以此爲業。然皆植之田間，其擔入城市售賣者，價值亦甚賤。種惟桃紅、深紫、壽安紅等，黃、白即僅見」。[154]

南京的水仙花，也是栽培技術變革的一個例證。萬曆年間，周文華《汝南圃史》曾說：「吳中水仙，唯嘉定、上海、江陰諸邑最盛」。[155] 于若瀛則說江南水仙，以嘉定的品種最好，「花簇葉上，他種則隱葉內耳」，其栽培法係將種子裝於沙囊中，懸於屋樑間風乾；播種之前，先將破草鞋寸斷，雜於屎尿中浸透，待其長芽方植入土，而以植入之早晚，斷定開花之先後，金陵人即使善於栽植者，「十叢不一二花」。[156] 但至清初，李漁 (1611-1679) 則云：「水仙以秣陵爲最。予之家於秣陵，非家秣陵，家于水仙之鄉也。」可見其對水仙之喜愛。又云：

> 不特金陵水仙為天下第一，其植此花而售於人者，亦能司造物之權，欲其早則早，命之遲則遲，購者欲於某日開，則某日必開，未嘗先後一日。及此花將謝，又以遲者繼之，蓋以下種之先後為先後也。至買就之時，給盆與石而使之種，又能隨手佈置，即成畫圖，皆風雅文人所不及也，豈此等末技，亦由天授，非人力耶！[157]

于若瀛係於萬曆三十二年 (1604) 由南京通政司右參議北調，赴北京任職太僕寺少卿，而李漁移家至南京是在康熙元年 (1662)，則在于若瀛離開後數十年間，南京水仙的種植技術有極大的進步。方以智 (1611-1671) 於《物理小識》曾談到南京安德門華嚴寺前花匠蓄養水仙，「但取大如卵者，夏出土懸之，九月積石子，栽數年乃大，大則開花」，又記載水仙栽培法云：「六月根囊出土，取懸簷下

---

[153]《淞南樂府》，頁171。

[154] 清・毛祥麟撰，畢萬忱點校，《墨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一，〈土產〉，頁9。

[155]《汝南圃史》卷九，〈草本花部上・水仙〉，頁36a。

[156]《弗告堂集》卷四，〈金陵花品詠〉，頁3b-4a。

[157] 清・李漁，《閒情偶寄》（臺北：長安出版社影印，1990），卷一四，〈種植部・草木第三・水仙〉，頁304。

風吹，又煙熏踰月，浸糞而復簷吹。十月盆栽，沙石水養，不用泥土，花高於葉，金盞銀臺。」[158] 由此看來，晚明以來江南花匠種植水仙，已多改爲水養而非土種。在栽培法競爭之餘，嘉定的水仙相形失色，晚清時嘉定的水仙已不再著名。[159]

又，揚州的傍花村向爲菊花名產地，栽培法自然是相當了得，但在乾隆年間，因新栽培法的引入而出現變化。其時，安徽六安州秀才葉冣夫善種菊，著有《將就山房花譜》，以花色做分類，「如銅雀爭輝、老圃秋容，皆異艷絕世」。乾隆四十二年 (1777) 來揚州，寓於是園一年多。其種法與傍花村不同，「不接艾梗，不植籬篠，先去螻蟻、蚯蚓薦食諸病根，松青紫杞，都歸自然」。冣夫個性孤寂，酒酣耳熱之後，每思將其所種菊花遍佈天下，「名花價值百縑，持贈自若」，揚州人因此多有得其所植菊花者。是園旁有周叟田地數畝、屋舍數椽，是園主人田氏欲將其買下，周叟不肯出賣，僅願於園內做園丁。周叟之子周扣子，後即因此習得葉冣夫種菊之法，號稱絕技。不過，這種技術雖在傍花村傳下來，但比起冣夫所自植，花色已少了一半。[160] 嘉慶二年 (1797)，林蘇門記道：傍花邨在揚州北門外葉公墳，附近周圍約三、四里，別無其他花卉，惟種菊而已。二十年前，有葉姓自遠方來，「攜異樣好菊種，留於邨，教以殖法，不數日，飄然而去，其或即葉公墳之後裔耶？」每當秋天菊花盛開，揚州人至傍花村觀菊者如堵，「無不憶及此事，無不尋玩葉家菊花，故相傳爲葉種」。[161] 此一記載已將葉氏及葉氏品種菊花神奇化。後來，葉氏的栽菊法，也傳至揚州其他種菊的村子（如堡城）。[162]

乾隆初年，許惟枚 (1689-1752) 曾經談到：栽培菊花所用泥土，以黃壤與沙壤最宜，故太倉、嘉定、崇明所產爲「三吳之冠」。[163] 而嘉定人張鴻圖更得「子種法」，「取子播種，花大如碗，異於他邑」。[164] 乾隆年間，嘉定菊花有數

---

158 清・方以智，《物理小識》（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年重刊本），卷九，〈草木類・水仙〉，頁16b-17a。

159 清・楊震福等修纂，光緒《嘉定縣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刻本），卷八，〈風土志・土產〉，頁14a。

160《揚州畫舫錄》卷一〇，〈虹橋錄上〉，頁240。

161《邗江三百吟》卷一，〈傍花邨尋菊花葉種〉，頁14b。

162《揚州覽勝錄》卷一，〈北郊錄〉，頁31。

163 清・許惟枚，《瀛海掌錄》（上海：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標點本，1963），卷四，〈鞠〉，頁53。

164 光緒《嘉定縣志》卷八，〈風土志・土產〉，頁14a。

百品種，以剪絨、宋紫最爲珍貴，但剪絨不可多得，宋紫常有十餘種，間或變異出新奇品種，顏色與花瓣完全不同，花匠「藝植必祕授」，外岡鎭中郁氏世傳其法。[165] 伴隨著花卉賞玩之風日盛，江南栽培菊花亦愈繁。嘉慶十三年 (1808)，趙翼 (1727-1814) 有詩談到：「吾鄉近來菊事繁，園戶俱工馬塍藝。」[166] 可見常州陽湖栽培菊花之風日盛。當時，江南各地植菊專家競出奇種，栽培技術亦存在競爭。嘉慶年間，計楠《菊說》曾說：「菊花種類甚繁，余好之深，友人相投贈者，近則嘉興、平湖、海鹽、松江、上海、嘉定、湖州，遠則湖北、揚州、江寧，各處皆出異種，惟蘇種至下，俱不留植。」[167] 蘇州培植菊花的技藝顯然不行。不過，光緒《光福志》記菊花時云：「元以來，吳中所植率皆粗俗，俱賣花者栽之。數十年來，光福許氏、木瀆錢氏，皆購覓細種，許氏之池上艸堂，錢氏之潛園，俱植萬本」，[168] 看來蘇州藝菊似有起色。

此外，杜鵑花一向以四川所出者最佳，清代常州宜興則頗有佳種。陳維岳 (1636-?)〈杜鵑花小記〉云：「宜興善權洞杜鵑，生石壁間，花碩大，瓣有淚點，最爲佳本，不亞蜀中也。」[169] 乾隆五十二年 (1787)，劉嗣綰 (1762-1821) 又提到：「近時杜鵑花盛行於南中，偶見陽羨土人有染成淺綠色者，名曰賽鸚哥」，詩中對於杜鵑花色能由紅變綠，頗感不可理解。[170] 由此看來，清代宜興已培養出淺綠色的杜鵑花。

附帶一提的是，在明清江浙花木栽培相當競爭之時，有人極力防止技術外流，有人卻願以花種相贈。清人戴殿泗 (1746-1825) 談到金華府城之北，有趙氏精於種花，浦江頤亭子馬琛爲種菊花，前往求賜花種。趙氏知老人能種菊，毫不吝惜，即以百種相贈，「於是置竹籃數器，實以土方尺，每寸土種菊秧其中，秧繫以花名，紙條書之，上蓋大葉草，越二百二十里而至」。馬琛種了之後，「燦

---

[165] 清・錢肇然編，乾隆《續外岡志》（上海：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標點本，1961），卷四，〈物產〉，頁66-67。

[166] 清・趙翼撰，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五〇，〈重九前一日管公祠看菊〉，頁1302。

[167] 清・計楠，《菊說》（收入《昭代叢書》辛集卷四九），頁2a。

[168] 光緒《光福志》卷四，〈土產〉，頁4a。

[169] 參見何小顏，《花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155-156。

[170] 清・劉嗣綰，《尚絅堂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85冊，據清道光六年大樹園刻本影印），卷九，〈近時杜鵑花盛行於南中偶見陽羨土人有染成淺綠色者名曰賽鸚哥詩以賦之〉，頁2a-b。

豔芬葩，甲於一時」，每年亦有人來乞菊，而他也不吝惜，即以花種及花名相贈。[171] 但此一例子位處浙東山區，而在江南這種商業競爭激烈之區，花農或許不會如此慷慨。

盆景風格

中國的盆景藝術，自中古以降迭有發展，迄至明代而大盛。[172] 萬曆初年，高濂曾說天下「盆景之尚」有五處最盛，即南京、蘇州、松江，浙江的杭州，與福建的浦城，「論值以錢萬計，則其好可知」。[173] 江南文人以樹石爲雅趣，爲盆景業帶來極大商機，因此出現了許多著名的盆栽能手，這些能手專精於剪裁盆栽，甚至創造新的流行風格，以取得更大的利潤。其中，南京與蘇州早已名聞遐邇。正德《江寧縣志》記載，南京安德、鳳臺二鄉出產蟠松，「園丁蟠植，有酷類馬遠画像者，可供庭陰盆池之玩」。[174] 正德《姑蘇志》亦記載：「虎邱人善於盆中植奇花異卉、盤松古梅，置之几案，清雅可愛，謂之盆景。」[175] 嘉靖年間，朱察卿 (?-1572) 也指出：

> 吳中人善植花木，植以市利者，輒戕賊柔條，作屏障狀、盤盂狀，或肖馬遠所畫奇樹，惟松、檜、梅易施巧力，即長不滿尺，已束縛於瓦缶中，亭亭若林矣。[176]

---

[171] 清・戴殿泗，《風希堂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71冊，據清道光八年九靈山房刻本影印），卷四，〈種菊老人傳〉，頁3b-4b。

[172] 參見梁家勉，《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北京：農業出版社，1989），頁353, 426-427, 537-538；南京農業大學等編著，《太湖地區農業史稿》，頁314-315；韋金笙，〈中國盆景史略〉，《中國園林》7.2 (1991)：11-14；舒迎瀾，《古代花卉》，頁54-66；胡一民，〈論我國元代的盆景技藝〉，《廣東園林》1999.3：23-24, 42；何小顏，《花與中國文化》，頁403-411；李樹華，《中國盆景文化史》（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5），頁2-80。

[173] 《雅尚齋遵生八牋》卷七，〈起居安樂牋上・居室安處條・居室建置・高子盆景說〉，頁39a。

[174] 正德《江寧縣志》卷三，〈物產〉，頁12b。

[175] 明・王鏊等纂修，正德《姑蘇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明正德元年刊本影印，1965），卷一四，〈風俗〉，頁10a。

[176] 明・朱察卿，《朱邦憲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45冊，據明萬曆六年朱家法刻增修本影印），卷六，〈顧汝和種梅記〉，頁17b。

萬曆初年，高濂述及盆景時，也談到最古雅者爲天目松，「高可盈尺，本大如臂，針毛短簇，結爲馬遠之欹斜詰曲，郭熙之露頂攫拏，劉松年之偃亞層疊，盛子昭之拖拽軒翥等狀，栽以佳器，槎牙可觀」。[177] 清朝初年，劉鑾《五石瓠》記道：「今人以盆盎間樹石爲玩，長者屈而短之，大者削而約之，或膚寸而結果實，或咫尺而蓄魚蟲，概稱盆景」。[178] 陳玉璂 (1636-?) 亦指出：虎丘所賣的盆景，「佳者每臨摹舊人山水」。[179] 沈朝初 (1649-1703) 的〈憶江南〉詞：「蘇州好，小樹種山塘。半寸青松虯幹古，一拳文石蘚苔蒼。盆裏畫瀟湘。」[180] 也道出蘇州盆景的特色。乾隆《元和縣志》談到虎丘的松樹，「繩約其枝，盤結作虬龍狀，久之遂若天成，高可五、六尺，低可二、三尺，凡剔牙、羅漢等松皆然」；虎丘的檜樹，「亦以人工盤結如松，每一本上，其枝屈曲作五、六層者勝」；至於梅樹，「虎丘人取江梅，以佳本栽接之，開花敷腴，名玉蝶梅。間有一枝上作兩色、三色者，亦取他本栽接，離奇蟠曲，古意可觀。」[181] 虎丘盆栽可謂歷久不衰。

晚明時，嘉定盆景又異軍突起，成爲眾所艷稱的時尚品物。據萬曆《嘉定縣志》記載，當地文士有「幽人之致，優游玩弄，或倣古名筆，修結花木，點綴盆池，老幹虬枝，綺葩繡錯，掩映成林，而高不盈尺，一樹培養，亘十餘年，慕者購之，捐金數笏，猶弗忍售」。[182] 當時，嘉定人李流芳 (1575-1629)、程嘉燧 (1565-1643) 即擅雕琢盆栽之術，竹雕名家朱纓（號小松），因與李流芳、程嘉燧等人交友，習得「小樹剪縶」之術，以供盆盎之玩，種植一樹甚至要十年，朱氏盆樹遂聞名於天下。[183] 後來，朱纓之子朱稚征（號三松）也從父親身上習得此法，「善仿名畫剪盆中花樹」，故清人錢大昕 (1728-1804) 有詩詠道：「移栽

---

[177]《雅尚齋遵生八牋》卷七，〈起居安樂牋上・居室安處條・居室建置・高子盆景說〉，頁39b-40a。

[178] 清・劉鑾，《五石瓠》（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九年《庚辰叢編》排印本），卷三，〈盆景〉，頁6a-b。

[179] 清・陳玉璂，《學文堂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47-48冊，據清康熙刻本影印），〈舟過虎丘復用前韻十首〉，頁20b。

[180]《清嘉錄》卷六，〈六月・珠蘭茉莉花市〉，頁133。

[181] 乾隆《元和縣志》卷一六，〈物產〉，頁5a-6a。

[182] 明・韓浚等修，萬曆《嘉定縣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08-209冊，據明萬曆三十三年刻本影印），卷六，〈田賦考上・風俗〉，頁37b。

[183] 清・王鳴韶，〈嘉定三藝人傳〉，轉引自清・金元鈺，《竹人錄》（收入《美術叢書》二集第五輯第60冊），卷上，頁11a。

盆樹綺窗妍，截得筠筒手自鐫。花鳥徐熙山馬遠，無人知是小松傳。」[184] 陸遵書亦有詩云：「盆栽短樹有風姿，裁剪原來得畫師。記得品題依次第，金銀黃柏巧名兒。」[185]

朱小松得剪裁盆景之術在萬曆年間，其子朱三松活躍年代已在明末。由於嘉定的盆景栽培，仿自文人畫之風格，在明末清初曾經引領江南盆景的風騷。順治十八年 (1661)，歸莊 (1613-1673) 在嘉定縣南翔鎮陸彥彬家中，就曾見到「盆樹森列，多得宋元畫家筆意」。[186] 明亡後滯留南京，以種植花木維生的陳淏子，於康熙二十七年 (1688) 刊行所撰《花鏡》，書中談到盆景也說：「近日吳下出一種，仿雲林山樹畫意」，放置數盆於高軒書室之前，「誠雅人清供也」，[187] 應該也是指嘉定風格的盆景。康熙中葉，陸廷燦（蘇州嘉定人）提到朱三松盆景云：

> 吾邑出盆景，名聞遠邇，與他處之棕線紮縛，盤屈而成者，迥不相同，始於明季。邑人朱三松，摹仿名人圖繪，擇花樹修剪，高不盈尺，而奇秀蒼古，具虬龍百尺之勢。培養數十年方成，或有逾百年者。栽以嘉盆，伴以白石，列之几案。間或北苑，或河陽，或大癡、雲林，儼然置身長林深壑中，此等購之最難得。後人雖有傳其脈者，終不能得其神髓。三松之法，不獨枝幹粗細上下相稱，更搜剔其根，使屈曲必露，如山中千年老樹，此非會心人未能遽領其微妙也。……近葉姓父子之後，并所謂傳其脈者亦竟無人，恐使見者，遂以為嘐域盆景不過如斯，良可慨也。[188]

由此看來，清初傳朱氏技法者爲葉姓父子，但已不能得其神韻，而在陸廷燦記載時，朱氏畫意的盆景已幾近失傳。康熙《嘉定縣志・物產》記盆景亦云：「今民

---

[184] 清・錢大昕撰，陳文和點校，《潛研堂詩集》（收入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第10冊），卷二，〈竹枝詞和王鳳喈韻六十首〉，頁18。

[185] 見清・王鳴盛，《練川雜詠》（收入王之增輯，《先澤殘存》〔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民國十五年校正重刊鉛字本〕），附〈陸即仙孝廉和韻〉，頁23b-24a。

[186] 清・歸莊，《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輯錄標點本影印，1984），卷六，〈尋菊記〉，頁384。

[187]《花鏡》卷二，〈課花十八法・種盆取景法〉，頁68-69。

[188] 清・陸廷燦，《南村隨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16冊，據清雍正十三年陸氏壽椿堂刻本影印），卷六，〈盆景〉，頁20b-21a。

間所蓄以市人者，樹既新嫩而布景亦失名家筆意，風斯下矣。」[189] 約略同時，趙俞 (1636-1692)〈盆樹〉詩題嘗云：「吳郡金閶多巧工，獨此非嘉定人不能傳其法。」可惜的是，後來模仿的花匠少有能得其神韻者。其詩云：「沿流失古初，密布雜叢薈。骨幹罕奇傑，嫩茂等少艾。琢玉花瓷缸，貨市走牙儈。崛強老風霜，不復人炙膾。」[190] 即使如此，嘉定盆景在清代仍相當有名。乾隆《續外岡志》記載：「鎮中郁氏素蓄盆玩，爲邑中之最。」[191] 另外，嘉定程庭鷺 (1797-1859) 也說：「今論盆栽者，必以吾邑爲最，蓋猶傳小松畫派也。」[192] 光緒七年 (1881) 所修的《嘉定縣志》，還將盆樹列爲該縣名產。[193] 其將盆樹列爲名產，正說明當地猶以栽培盆樹著名。

除以上數處之外，揚州也有不少人栽培盆景。崇禎十四年 (1641)，郝璧〈廣陵竹枝詞〉詠道：「結束小松紫石陰，雲林疏景氣蕭森。寸膚意致千蒼色，不說梅岑與雪岑」，[194] 所述即爲畫意盆景。清朝初年，冒襄 (1611-1693) 亦述及揚州如皐有孫姓者，「非雅非俗」，但有盆石之癖，其人逝世後，家人意欲求售，他冒著雪天前往觀看，即以銀一錢買得二十多盆，「雖無甚奇珍，亦其人數十年生事也」。將盆景橫列几案之上，「繁條禿幹，別有荒寒、枯槫、巧癭，皆成異趣」，而「黛色蒼髯，春華秋實，莫不慳年於尺寸之中，寄傲在風霜之外」。然而，其一生投注於盆景栽培，死後一切成空，冒襄因是感念「斯人何獨怡情于此」？[195] 乾隆年間，揚州城外草河桃花庵之花匠，亦善培養盆景，蓄植短松、矮楊、杉、柏、梅、柳等樹，其海桐、黃楊、虎刺，則以小著稱。所用之盆，以景德窯、宜興土、高資石爲上等。所種之樹多寄生，「剪丫除肆，根枝盤曲，而

---

189 轉引自李樹華，《中國盆景文化史》，頁61。

190 清・趙俞，《紺寒亭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55冊，據清康熙年間刻本影印），詩集卷五，〈邑中李長蘅客夏斗疊宣州石剪樹作盆景朱清父號小松父松鄰子三松雕竹根為文具二物走四方每貴重之吳郡金閶多巧工獨此非嘉定人不能傳其法余暇日各作詩一首譜其事亦微有托寄焉以備修志乘者採掇云・盆樹〉，頁7b-8a。

191 乾隆《續外岡志》卷四，〈物產〉，頁67。

192 參見韋金笙，〈中國盆景史略〉，頁13。

193 光緒《嘉定縣志》卷八，〈風土志・土產〉，頁15b。

194 明・郝璧，《郝蘭石集》（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第586冊，據清順治吳芷刻本影印），卷一八，〈廣陵竹枝詞〉，頁6b。

195 清・冒襄，《巢民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99冊，據清康熙年間刻本影印），卷四，〈偶得盆中樹石記〉，頁11a-b。

有環抱之勢；其下養苔如鍼，點以小石」，時謂之「花樹點景」。[196] 朱標就是當時剪裁盆景的名家，其別墅在新城北邊之柳林，別墅門前栽植柳樹，園內種植四時花樹，「盆花庋以紅漆木架，羅列碁布，高下合宜」，揚州城中富家，「以花事爲陳設，更替以時，出標手者獨多」。[197] 另外，寓居揚州的徽州人吳履黃，亦善於培植盆梅，「能于寸土小盆中養梅，數十年而花緐如錦」。[198] 而揚州秀才張縫「精刀式，謂之張刀，善蒔花」，其梅樹盆景，與秀才姚志同、致仕知府耿天保齊名，人稱「三股梅花剪」；其後，張其仁、劉式三鬍子、吳松山道士，並仿效其剪法。[199] 張、劉等人有時還被請到如皐去幫人修剪盆景。嘉慶年間，姜靈煦即有詩道：「盆樹枝卑試雉皐，樹抽小樹豈嫌高。皐人學改皐花樣，我倩張劉好剪刀。」[200] 嘉慶年間，揚州盆景栽培者仍多。李琪 (1781-?)《崇川竹枝詞》即詠道：「綺石黃磁小閣深，安排蒲草又茸針。」詩註云：「郡多花匠，善治盆玩。」[201] 晚清惺庵居士《望江南百調》亦詠及盆景云：「揚州好，花局試徘徊。繞屋清陰蘆箔護，分行濃豔瓦盆栽。雅意比憐才。」[202]

另外，杭州亦有不少花匠栽培盆景。清初張岱 (1597-1685) 曾談到杭州城外的西谿多古梅，「梅格短小，屈曲槎枒，大似黃山松。好事者至其地，買得極小者，列之盆池，以作小景」。[203] 乾隆年間，方薰所繪《太平歡樂圖》也記及杭州有人栽植盆梅，「高不過尺許，雪蕊冰姿，可供雅玩。買置几案間，宛有水邊籬下之意」。[204]（參見圖二）又，道光年間，杭州城外昌定鄉所產的千葉盆梅，也銷至杭州西南一百二十里的新城縣。[205]

196《揚州畫舫錄》卷二，〈草河錄下〉，頁35。

197 同前書，卷三，〈新城北錄上〉，頁79。

198 同前書，卷一二，〈橋東錄〉，頁279。

199 同前書，卷四，〈新城北錄中〉，頁80-81。

200 清・姜靈煦，〈漁灣竹枝詞〉，收入《江蘇竹枝詞集》，頁93。

201 清・李琪，《崇川竹枝詞》（收入《歷代竹枝詞》第3冊，丁編），頁2081。

202《望江南百調》，頁7a。

203 清・張岱撰，馬興榮點校，《西湖夢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五，〈西湖外景〉，「西谿」條，頁78。

204 方薰繪，《太平歡樂圖》，頁48a；董棨繪，《太平歡樂圖》，圖80，〈藝盆梅〉，頁161。

205 龔嘉儁等修纂，民國《杭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十一年鉛印本影印，1983），卷七八，〈物產一〉；原見道光《新城縣志》，頁9b。

從以上這些例子看來，有創意的盆景栽培高手多爲文士或僧道，由於其剪法獨特，價格也頗貴。清朝初年，虎丘張豫園善植盆景，有一盆剔牙松結構古雅，崑山張維惠看後，以銀子百兩金買得。[206] 乾隆年間，蘇州有僧人離幻，善於種植花卉盆景，一盆價值銀百兩。常往來於蘇州、揚州間，每到揚州，「玩好盆景，載數艘以隨」；其所插瓶花，不用針與鐵絲，每一瓶須銀四錢。[207] 又，吳縣沈復 (1763-?) 自小愛花成癖，喜剪盆樹，結識名家張蘭坡後，「始精剪枝養節之法，繼悟接花疊石之法」，在《浮生六記》中就談到其栽培盆景的心得，指出要剪裁出一盆好樹，至少要三、四十年。他說鄉人萬彩章一輩子僅剪出名品數盆，又在揚州商家，見有虞山人攜黃楊、翠柏各一盆送予商人，其餘則未見其可；而像「留枝盤如寶塔，紮枝曲如蚯蚓者」，則是匠氣作法。[208] 這種文人化的盆景，後來也爲一般花匠所模仿，形成一股流行風潮。龔自珍 (1792-1841) 即道出這個現象：

> 江寧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谿，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欹為美，正則無景；梅以疏為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殀梅、病梅為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為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209]

細讀這段話，除點出江寧龍蟠、蘇州鄧尉和杭州西谿盆梅之特點外，亦指斥病態盆梅之風格乃文人畫士所創造，故引文中有「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爲也」之言。後來，有人將文人畫士孤癖的美感告知賣梅者，花匠於是「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羣起仿傚的結果，遂造成江浙梅樹皆成病態。這則記載呈現了盆景風

---

[206] 清・褚人穫，《堅瓠續集》（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二十三編》〔臺北：新興書局，1985〕，第9冊，據民國三年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影印），卷三，〈盆景〉，頁15a。

[207]《揚州畫舫錄》卷一五，〈岡西錄〉，頁359。

[208] 清・沈復著，唐紹華校註，《浮生六記》（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5），卷二，〈閒情記趣〉，頁35, 37。關於沈復對盆景的看法，請參見徐波，〈清代盆景文化之個案研究〉，《上海大學學報》7.2 (2000)：53-57。

[209] 清・龔自珍著，王佩諍點校，《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第三輯，〈病梅館記〉，頁186。

格與市場運作之間的關係，而文人與畫士則爲這個市場中的主角。大體上，我們可以將盆景的市場分爲幾個層次，其一爲創造風格的文士，其次爲在後跟隨的花匠，其三係盆景市場運作中的末端，即許多喜歡盆景的士大夫與富豪之輩，這三者交織在盆景的生產與交易的網絡之中。而買得一盆炙手可熱的好盆栽，或許又可以在市場上炒作一番，增加盆景市場上的熱度。

三・消費需求與市場擴張

嘉靖年間，歸有光 (1507-1571) 談到江南，曾說其「俗好媮麗，美衣鮮食，嫁娶葬埋，時節餽贈，飲酒宴會，竭力以飾觀美。富家豪民，兼百室之產，役財驕溢；婦女、玉帛、甲第、田園、音樂，擬于王侯」，[210] 短短數語，道出了江南豪富充斥、社會奢華，與消費能力之強。而江南風氣之所以如此，實乃明中葉以降商品經濟發展所促成，故商人與官宦財力較前豐厚，消費能力也比之前要強。[211] 江南這樣的消費能力，對於花卉市場的發展具有正面的作用。江南士大夫構築園林之風，與講究花木在園中的配置，[212] 對園藝花木的需求就有所增加。嘉靖年間，唐順之 (1507-1560) 嘗云：江南人造園林，「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百錢買一花，不自惜」。[213] 其例子如嘉靖、萬曆年間，太倉王詹事父子，生平無其他嗜好，獨好欣賞花卉，於花又獨好菊花和牡丹，每當花開時，「馳價募購，亡論近遠」。[214] 晚明時，吳昌時 (?-1643) 在嘉興秀水鄉

---

[210] 明・歸有光撰，周本淳點校，《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一一，〈送崑山縣令朱侯序〉，頁254。

[211] 參見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東亞文化》（漢城，今首爾）24 (1986)：83-110。

[212] 參見金學智，《中國園林美學》（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0），頁292-334；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0），頁148-157；任常泰、孟亞男，《中國園林史》（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頁176-215；程里堯主編，《中國古典園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226-257；曹林娣，《中國園林藝術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頁171-184；朱倩如，《明人的居家生活》（宜蘭：明史研究小組，2003），頁113-144；魏嘉瓚，《蘇州古典園林史》（上海：三聯書店，2005），頁197-412。

[213] 明・唐順之，《重刊校正唐荊川先生文集》（東京：高橋情報據明嘉靖三十二年刊本影印，1991），卷八，〈任光祿竹溪記〉，頁30a。

[214]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臺北：文海出版社據明崇禎年間刊本影印，1970），卷六〇，〈太倉諸園小記〉，頁9b-10a。

居，自奉甚爲豪奢，坐榻四週環列梅花一百盆，梅花之外，稍低一二尺，鋪上氈毯，又擺水仙一百盆，盆子皆用極好磁器。[215] 順治年間，嘉定南翔鎮陸彥彬雅好花事，往往不惜重金購置，家中菊花上品極多，品種常以百計，其剪絨又爲諸家所無。[216] 康熙年間，《花鏡》亦談到：「每見世俗好花，不惜重資購取。」[217] 此一對花卉的需求，使花匠霑享其利，而士大夫也得其所愛。除居家擺設之外，畫舫上也擺置花樹，故乾隆年間顧瑤光詠虎丘，有「畫船花竹似名園」之語。[218] 另外，商家店肆也多以花卉裝飾，楊光輔（嘉慶元年歲貢）就說上海人崇尚盆樹，「大家庭院固所必備，即市肆之尺天寸地，亦於屋簷架露臺羅列諸品，梯而灌溉，不厭其煩。若洋松、洋鵑、洋楓之類，價倍他產」。[219] 則上海之士紳與商家亦無不擺設盆樹，甚至往立體空間發展。以上種種，對於花卉交易而言，均是重要的利源。

市場網絡

明清江南城市做爲花卉種植、花卉交易、花卉賞玩匯集之地，與商品經濟的關係至爲密切。江南的商業網絡主要是以水路爲主、陸路爲輔，[220] 花卉交易藉由這一便捷的水運交通，形成了一個以蘇州爲中心的花卉商業市場，涵蓋整個長江三角州，北至揚州，西北至南京，東南到松江，西南至杭州等地。在這個區域之中，各城市的花卉貿易彼此交織。

嘉靖至萬曆年間，是江南花卉市場發展的重要時刻。由於交通四通八達，不祇以上所提到的幾個府城的城郊花農將花運入府城中，即使稍遠的縣城也將所產花卉載運至此，網狀的花卉市場圈隨之形成。嘉靖年間，《西湖遊覽志餘》談到牡丹時說：「近日杭州牡丹，黃紫紅白咸備，而粉紅獨多，有一株百餘朵者。出昌化、富陽者尤大，不減洛陽也。」[221] 在杭州西邊約百公里的昌化，與西南邊

---

[215]《歸莊集》卷一〇，〈隨筆二十四則〉，頁515。

[216] 同前書，卷六，〈尋菊記〉，頁383。

[217]《花鏡》卷二，〈課花十八法・辨花性情法〉，頁40。

[218] 清・顧瑤光，《又竹枝詞五十首》（收入《歷代竹枝詞》第1冊，乙編），頁915。

[219]《淞南樂府》，頁175。

[220] 關於明清江南的水運，參見陳學文，〈明清時期江南的商品經濟與水運業的發展〉，收入氏著，《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1997），頁99-120。

[221]《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四，〈委巷叢談〉，頁435-436。

三十餘公里的富陽，已成爲杭州花卉貿易網絡的一環。在此一時期，除了縣城與府城的花卉產銷網絡聯結在一起之外，江南幾個大城市之間的花卉貿易也相當熱絡，花卉運銷的範圍亦跨越數府。萬曆年間，王穉登整修其蘇州府長洲縣的宅院時，曾請洞庭山花匠陸伯相造松壇，擺放許多松樹，因此得於月下加以觀賞。後來，陸伯相載運盆栽花木赴揚州販賣，王穉登寫信給在揚州的朋友吳山人，請其多找些朋友照顧生意：

> 僕之友陸君伯相，洞庭名流種花奴，富如封侯。霜後採之，不啻數十石，買舟過維陽求售。足下幸遍千諸君，將錢買洞庭霜，大勝事！令陸君腰纏騎鶴而東，豈不感吳君哉！[222]

這封信呈現了花匠與文人之間的關係，可以想見花卉市場上文人居間吹捧的情況。陸伯相或許就因爲王穉登的推薦，獲得更多的利益。推其原始，就緣於其爲王穉登造松壇。對聰明的花木匠而言，若能做成一位名士的生意，經由文人之間的彼此介紹，其生意將源源不斷，營業圈可以遠至數府之外。萬曆末年，顧起元(1565-1628) 在《客座贅語》談到：

> 几案所供盆景，舊惟虎剌一二品而已。近來花園子自吳中運至，品目益多，虎剌外，有天目松、瓔珞松、海棠、碧桃、黃楊、石竹、瀟湘竹、水冬青、水仙、小芭蕉、枸杞、銀杏、梅華之屬，務取其根榦老而枝葉有畫意者，更以古瓷盆、佳石安置之，其價高者一盆可數千錢。[223]

按《客座贅語》成於萬曆四十五年 (1617)，則在十七世紀之初，南京的盆景市場出現了重大變化，即虎丘的盆景遠遠不斷地供應而來。晚明的江南，是繁華的世界，綺麗與奢靡早爲學者所指出，而精緻的賞玩之風亦日新月異，[224] 南京漸漸受到這股風氣的影響，高價值的盆栽花木也在市上出現。且在晚明，此地聚集了一批文人雅士，對於盆景花木的興趣與需求或許要比之前高，也就因爲有這些客源，花匠才會輸入蘇州所栽培的盆景讓人選購。顧起元又云：

---

[222]《謀野集》卷一，〈與吳山人〉，頁22b。

[223] 明・顧起元撰，譚棣華、陳稼禾點校，《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一，〈花木〉，頁18。

[224] 相關研究，參見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王鴻泰，〈閒情雅致——明清文人的生活經營與品賞文化〉，《故宮學術季刊》22.1 (2004)：69-97；〈雅俗的辯證——明代賞玩文化的流行與士商關係的交錯〉，《新史學》17.4 (2006)：73-144。

> 牡丹、芍藥與藕，此土多有之，顧多產自它郡邑。聞嘉靖以前，牡丹與藕之種僅五六品，近來品類始多。牡丹從江陰或亳州或陝中致之。芍藥自揚州載而至。若藕，自盧苑、馬東籬品彙錄成，搜求異種，不憚遐遠，故所紀踰百餘種，而藕之事為最侈矣。[225]

可見嘉靖以降，南京市面上的許多花卉乃由外地輸入，如芍藥來自揚州，牡丹從江陰或更遠的河南、關中，至於菊花則或許來自四方。《客座贅語》又載：三十年前，即萬曆初年，有人從福建攜佛桑花至南京，其舅舅王公甚覺稀奇，至萬曆末年則常見此花。其花色絕艷美，紅者瓣如襞紅縐紗，又有淡紅、赭黃、鵝黃者，夏秋之間花期長達三個月。[226]

實際上，由外地運至的花卉不止於此，蘭花和茉莉花也是其一。萬曆初年，張應文《羅鍾齋蘭譜》指出：宜興、杭州的山農，就常掘取山中蘭蕙，用竹籃裝著，運至蘇州販售，蘇州人買到後，以盆子栽植，置於几案間賞玩。[227] 又云：蘭花從遠方運來者，主要有兩個途徑，其一爲福建，另者爲江西，但「閩少而優，贛多而劣」，福建蘭花運至蘇州者「十未一二」。[228] 由於運至江南者不多，故福建蘭花甚爲珍貴。至於茉莉花，萬曆末年《汝南圃史》記道：「今江東及吳地所有，皆從江右載來，唯贛州者尤佳。舟行路遠，率用壟糠入盆底，取盆輕易攜。」[229] 由於江西的蘭花與茉莉大量運至江南售賣，故王稺登有詩云：「贛州船子兩頭尖，茉莉初來價便添。公子豪華錢不惜，買花指揀樹齊檐。」另一首云：「章江茉莉貢江蘭，夾竹桃花不耐寒。三種盡非吳地有，一年一度買來看。」[230] 晚明時，文震亨 (1585-1645)《長物志》亦云：江西人編籬插棘，俱用茉莉花，而當茉莉花開時，「千艘俱集虎丘，故花市初夏最盛」。[231] 直至清初，江南茉莉主要仍來自江西。方文 (1612-1669)〈茉莉謠〉曾云：「章貢交流

---

[225]《客座贅語》卷一，〈花木〉，頁14。

[226] 同前書，卷一，〈花木〉，頁14。

[227]《羅鍾齋蘭譜》，〈列品〉，頁332-333。並見《汝南圃史》卷九，〈草本花部上・蘭〉，頁2b。

[228]《羅鍾齋蘭譜》，〈列品〉，頁329。

[229]《汝南圃史》卷七，〈木本花部下・茉莉〉，頁11a-b。

[230] 原見明・錢謙益，《歷朝詩集・丁集》，轉引自黃長椿，〈明代江西贛州的種花業〉，頁210。

[231] 明・文震亨，《長物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2冊），卷二，〈花木・茉莉素馨百合〉，頁8a-b。

處，種花如種田。家家千百本，爭附下江船。」[232] 至於福建的茉莉，晚明時亦有客商在仙霞嶺下裝花擔，過山後送往蘇州發賣。清初由於東南一帶長期戰亂，福建茉莉短缺，因此價格大漲。彭孫貽 (1615-1673) 曾賦詩云：「戰爭久斷海南天，一本閩花價十千。學得閩天分剪法，衣花食卉殼年年。」[233]

在商業網絡與栽培技術雙重助長下，晚明江南城市的賣花業大興。萬曆末年，張大復回憶起萬曆初年年紀輕時出遊南京，聽到當地的賣花聲，心中頗覺暢樂，因爲故鄉崑山向來不聞賣花聲。然當時南京只賣茉莉一種，玫瑰則偶爾有之。近年來，即使是崑山，也是「老婦、稚子，觔觔於道，典花取錢，市賈無異」，故他說：「賣花，古之遺事，然未有無所不賣如今日者」。[234] 這種到處是賣花人、且無所不賣的情況之所以出現，明顯與晚明江南花卉種植之興盛和商業網絡之擴展有關。當時，李日華就說江南是無花不有：

> 天下有九福，燕都屏帷福，雒陽花福，蜀川藥福，秦隴鞍馬福，韓趙裘裳福，吳越口福，然江南所歉，唯裘馬耳，其它事事不遜。近日，甌閩滇粵之花悉至，園館爛然，非復洛中可擬。諺謂居江南者，三月病目，八月病腹，即係無福人，良有以也。[235]

所謂「天下有九福」之說，出自北宋初年陶穀 (903-970) 的《清異錄》，其原文爲：「天下有九福，京師眼福、錢福、病福、屏帷福，吳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藥福，秦隴鞍馬福，燕趙衣裳福。」[236] 李日華所述缺眼福、錢福與病福，而討論最多者爲花福。萬曆年間，南方的溫州、福建、廣東與雲南等地的許多花卉，或透過商品經濟的網絡，或透過栽培技術的提昇，皆在江南之地出現，故原來獨享花卉之福的洛陽，已難與江南相抗衡。就在這個情況下，晚明江南各城市的花卉販賣大興。

進入清代，江南橫跨數府的花卉銷售依然可見。乾嘉年間，揚州城北傍花邨，「種菊至數百畝，田家籬落，風景絕佳」。阮元 (1764-1849) 爲揚州人，在

---

[232] 清・方文，《嵞山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40冊，據清康熙二十八年刊本影印），《西江游草》，〈茉莉謠〉，頁25b。

[233] 清・彭孫貽，《茗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據清海鹽張氏涉園藏寫本影印，1975），卷一九，〈和錢象先茉莉曲十首〉，頁76a, 77b。

[234]《梅花草堂筆談》卷七，〈賣花〉，頁16b。

[235]《紫桃軒雜綴》卷四，頁5a-b。

[236] 宋・陶穀，《清異錄》（收入《寶顏堂祕笈》第8函），卷一，〈人事門・九福〉，頁13b。

杭州巡撫任上，每年九月時，「花奴自揚州載菊一舟來，一時瓶盎軒階俱滿，奉嚴親宴花廳下，饒有家鄉風景」。[237] 阮元的例子或許比較特殊，但花卉長程運銷，在清代江南並不罕見。揚州所產的芍藥，甚至運往湖廣銷售。吳敏樹 (1805-1873)〈同胡湘杜岳州竹枝詞十六首〉曾詠道：「運漕連歲出天津，花樹揚州事事新。自從事變船停了，芍藥無花不算春。」[238] 足見在太平軍興之前，揚州芍藥在岳陽是極搶手的花卉。至於城市間的花卉貿易，仍是相當興盛。如同治年間，王韜 (1828-1897) 曾說：上海本身雖產菊花，但秋天時「盈船販售者，則金閶、虎阜種也，索值較賤，而間有佳品，朱門巨室，爭相購置」。[239] 可見蘇州花船將菊花運至上海出售。

此外，江南周邊各省所產的蘭花也都輸入蘇州、上海等地。乾隆初年，納蘭常安記載浙江金華府境內香山產玉蘭，「無葉而花白有香」，山下有香溪，「吳門販蘭者多聚此，以錢米與牧豎易蘭，滿載入吳，置潤澤溫煖處，催之使放」。[240] 乾隆晚年，王芑孫〈山塘種花人賦〉最後兩句也說到：「花神祀罷祝宜男，郎去蘭溪販蘭種」，[241] 顯見蘇州花匠至浙東山區購取蘭種。嘉慶元年 (1796)，朱克柔《第一香筆記》記載：「近來出蘭蕙處，攜販至蘇門者，徽、浙居多。其各山採產無常，或此山竭取，復至他山搜羅殆徧」。[242] 嘉慶十八年 (1813)，方時軒《樹蕙編》記蕙蘭亦云：「吳中山貨行所售原簍，有時頗得佳瓣」，係寧波、紹興、台州一帶所產。[243] 光緒二年 (1876)，袁世俊 (1837-1891)《蘭言述略》也說浙江山上蘭蕙初開時，山民即將其挖下，放置於竹簍中，每簍

---

[237] 清・阮元撰，鄧經元點校，《揅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四集詩卷五，〈駐杭州時每九月花奴自揚州載菊一舟來一時瓶盎軒階俱滿奉嚴親宴花廳下饒有家鄉風景為寫秋江載菊圖題之〉，頁836。

[238] 清・吳敏樹，〈同胡湘杜岳州竹枝詞十六首〉（收入《歷代竹枝詞》第3冊，戊編），頁2194。

[239] 清・王韜著，沈恒春、楊其民標點，《瀛壖雜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一，頁19。

[240] 清・納蘭常安，《宦遊筆記》（臺北：廣文書局據清乾隆十一年刊本影印，1971），卷三七，〈浙江九・金華府・香山〉，頁5a。

[241]《淵雅堂全集・惕甫未定稿》卷一，〈山塘種花人賦有序〉，頁7a。

[242] 清・朱克柔，《第一香筆記》（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元年刊本），卷四，〈引證〉，頁2b。感謝巫仁恕教授惠賜此一資料。

[243] 清・方時軒，《樹蕙編》（收入《邈園叢書》〔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民國三十三年吳興周延年彙編本〕，第9冊），頁17b。

裝二、三千蕊，運銷至蘇州、上海花市，每年冬天約二百萬蕊。隔年春初，以窖或缸溫烘，「粗者售以簪鬢，褻視等於珠蘭、茉莉，根葉皆棄之」，至於細者，則轉售予培植者。每年春初，蘇州、上海兩地約銷三千簍，每簍裝一、二百蕊，而以蘇州爲多，上海較少，其餘則分銷至他處。[244] 晚清《杭俗怡情碎錦》亦談到杭州府境內，蘭花產於富陽各山，冬至起到春正月、二月，用長篾簍裝盛，發往上海、蘇州，賣花一季。[245]

眾所皆知，水運交通對於清代江南花卉運銷相當重要，嘉興府秀水縣盛澤鎮的花船匯，就是賣花船叢集之所。[246] 而江浙的夜航船，也在花卉運銷中擔負著特殊的角色。夜航船早在唐宋已存在浙西一帶，[247] 元朝末年陶宗儀 (1316-1403) 也說：「凡篙師於城埠市鎮人煙湊集去處，招聚客旅裝載夜行者，謂之夜航船。太平之時，在處有之。」[248] 晚明商業書也多談到夜航船，如萬曆四十五年 (1617) 版的《水陸路程》記湖州有夜航船開往震澤、南潯、烏鎮、練市、新市、雙林、浩溪、梅溪等市鎮，以及安吉州、長興縣、武康縣、德清縣、宜興縣各縣城與杭州府、蘇州府二府城。[249] 天啓六年 (1626) 版的《士商類要》更記到，由蘇州閶門搭湖州夜航船至吳江，航程五十里，每人與銀二分；由湖州西門外搭夜航船至楊家莊九里，每人與銀一分；而由蘇州閶門經南潯至東遷十二里，則與銀八釐。[250] 順治年間，吳履震《五茸志逸》亦載：「凡州郡邑有日航、夜航，一以白晝通商賈，一以供急務之宵渡。」[251] 袁枚《續子不語》也提到「杭州夜航船，夜行百里」。[252] 乾隆五十二年 (1787)，陳祁 (1748-?)《清風涇竹枝詞》曾詠及鎮民搭夜航船買花：「白蕩蘆墟水拍浮，買花慣趁夜航舟。黃昏猶宿姑蘇

---

[244] 清・袁世俊，《蘭言述略》（臺北：廣文書局據清光緒二十三年重刊本影印，1976），附錄，頁39b-40a。

[245]《杭俗怡情碎錦》，〈果食類・土產〉，總頁38。

[246] 沈雲，《盛湖竹枝詞》（收入《江蘇竹枝詞集》），頁847。

[247]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卷七，〈事實・夜航船〉，頁166。

[248] 明・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59），卷一一，〈夜航船〉，頁137。

[249] 參見陳學文，《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頁111。

[250] 參見前書，頁47, 114, 187。

[251]《五茸志逸》卷八，頁492。

[252] 清・袁枚著，鍾明奇校點，《續子不語》（收入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第4冊），卷六，〈夜航船二則〉，頁106。

驛，一夕風吹石鋪頭。」詩註云：「里由蘆墟三白蕩至蘇州僅百餘里，順風一夜可達。石頭鋪在里內，爲夜航船停泊之所。」[253] 而許多花農也利用此一運輸工具爭取時間，趁夜運送花卉至大的城市販賣。嘉慶年間，李林松 (1770-1827)〈申江竹枝詞〉即詠道：「一村紅樹起煩煙，冬至朝朝霜滿天。要向城中賣花去，夜來趁上夜航船。」[254]

清代江南花卉的市場網絡，有一個比較重要的發展，即海禁較前鬆綁，沿海航運越來越盛，[255] 故不少南方的花卉由海路運輸而至。如明代主要由江西運來的茉莉花，頗多轉由閩、粵運來。乾隆年間，李行南《申江竹枝詞》云：「茉莉清姿，廣船載至，買供庭院，香透紗櫥。」[256] 乾嘉年間，蔣寶齡 (1781-1840)《吳門竹枝詞》亦詠道：「蘋末風微六月涼，畫船銜尾泊山塘。廣南花到江南寶，簾內珠蘭茉莉香。」[257] 可見珠蘭、茉莉，均由廣東運來。道光年間，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亦云：

> 茉莉一名抹麗，謂清芬鬱烈，能掩眾花也。……生於嶺外，有藤本、木本，有寶珠、千葉、重臺，色有綠、黃、紫。吳中但有單瓣白色者。其花畏寒難活，往往一年即枯。每當薰風乍拂，花賈從閩中海販而至。[258]

此處也指出茉莉自福建海運而來。當時蘇州從事閩、粵花卉進口者，應即第一節所提到的三山花幫、長樂花幫，與東粵高荷天、東粵陳樂軒、閩省福新興這些商號。另外，嘉慶初年，林蘇門曾說揚州的蘭花，主要來自宜興山產，福建龍巖所產的建蘭，花開每幹九枝、十枝居多，即使非素心蘭，其蘭品已是最上，比起江西的贛州蘭，不啻天壤之別。乾嘉之際，南門護國菴、新城轅門橋一帶花市，偶爾會有三、五盆素心龍巖蘭到，愛者見之即不惜重價買去。[259] 揚州市面上所出現的龍巖建蘭，應該也是透過海運而來。至晚清，東海沿海海運愈盛，閩浙蘭花進口至江南者愈多。光緒二十九年 (1903)，秦榮光 (1841-1904)《上海縣竹枝

---

[253] 清・陳祁，《清風涇竹枝詞》（收入《歷代竹枝詞》第2冊，丙編），頁1444。

[254] 清・李林松，〈申江竹枝詞〉，收入顧秉權編，《上海歷代竹枝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457。

[255] 參見郭松義，〈清代國內的海運貿易〉，《清史論叢・第四輯》（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92-110。

[256] 清・李行南，《申江竹枝詞》（收入《上海歷代竹枝詞》），頁29-30。

[257]《清嘉錄》卷六，〈六月・珠蘭茉莉花市〉，頁133。

[258]《吳郡歲華紀麗》卷六，〈六月・茉莉花籃〉，頁213-214。

[259]《邗江三百吟》卷七，〈素心蘭雅愛龍巖〉，頁14a-b。

詞》有詩云：「蘭裝竹簍浙閩來，價值千金一朵開。歲歲廟園花會盛，俗傳上海種珍倍。」詩註指出來自浙、閩的蘭蕙，每年約數千簍，「蒔花之家，擇其佳品，有價值千金之蓄，沿傳爲上海種，名著三吳」。[260] 袁世俊《蘭言述略》也記載：每年江浙有木頭船至福建，水手上山搜掘野生建蘭，運至寧波、乍浦、上海等地沿街挑賣，價錢賤者僅需數百文錢。[261]

除了東南沿海的花卉北上之外，商人也將江南的水仙、牡丹和玫瑰運往廣東銷售。清康熙年間，屈大均 (1630-1696)《廣東新語》曾記道：「水仙頭，秋盡從吳門而至，以沙水種之，輒作六出花，隔歲則不再花，必歲歲買之。牡丹亦然。」他曾賦詩述其事云：「冬盡人人爭買花，水仙頭共牡丹芽。」[262] 此外，江南的千葉梅花也銷往廣州。嘉慶年間，曾燠 (1759-1830) 在廣州記道：「近日市中多帖子，寫『新到江南千葉梅花』字樣」。[263] 道光年間，《金陵待徵錄》記載：「玫瑰花，溧水極蕃，估人以竹簍固封，舟載入粵，一度梅嶺，則濃芬遠播，會城徧傳花客來矣。」[264] 晚清時，華北的花卉也由海船轉運南下。光緒九年 (1883)，黃式權 (1852-1924)《淞南夢影錄》嘗云：上海壓鬢之花，向俱來自蘇州、常州，但自天津店興盛之後，「斂色敷香，無不以京氏爲貴，釵蟲蠟鳳，裊裊盈盈，拗以銅絲，綰以采縷，日新月異，花樣無窮」；近年又有玻璃花，乃西洋人所製，故「美人頭上頗不寂寥，何必茉莉、珠蘭始足助曉妝之用哉！」[265] 從這段記載可以發現兩個現象，其一爲上海的簪花風格受到北京影響，另外則西洋的玻璃花也成爲婦女的髮髻裝飾品。

隨著海上交通日盛，許多外國花卉隨之傳入。康熙初年，劉廷璣 (?-1676) 云：「繡球一名雪毬，一名玉團，舊皆大本大樹。近以通洋，自洋載至中國者，名洋繡毬，草本也。」[266] 是洋繡毬已傳入中國。康熙三十二年 (1693)，高士奇

---

[260]《上海縣竹枝詞》，〈物產〉，頁105。

[261]《蘭言述略》卷三，〈雜說〉，頁34b。

[262] 清・屈大均著，李默校點，《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二七，〈草語・水仙〉，頁700。

[263] 清・曾燠，《賞雨茅屋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84冊，據清嘉慶二十四年刻增修本影印），卷一二，〈答香海報梅之什〉，頁18b。

[264]《金陵待徵錄》卷一〇，〈志物〉，總頁172。

[265] 清・黃式權著，鄭祖安標點，《淞南夢影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三，頁128。

[266]《在園雜志》卷三，〈繡毬〉，頁116。

述及海船載來東洋茶花，有紅、白二種，「紅者正赤千葉，白者花大如椀，中含金粟，與花瓣相錯，開久微紅」。[267] 乾隆初年，陳金浩亦有詩詠道：「出洋估舶候風還，載得洋花入海關。」[268] 其中，又以洋菊花最受注意。雍正《揚州府志》記載：「種菊者多從遠方購致異種，洋菊尤奇。」[269] 嘉慶年間，秋意華農說道：花市所賣菊花，不外麤種與洋種，洋種來自海外，經商舶帶進，他曾廣爲收集與種植。[270] 道光年間，《清嘉錄》也提到吳縣貝三泉善種菊，著有《藝菊說》，「種皆來自海洋，自養苗至放花，備載培植之方」。[271]《滬城歲事衢歌》亦載：「菊之高大者皆洋種，花光飽滿，數目不減。其別種曰棠春，花小而光內斂，多鑲色。」[272] 五口通商以後，洋花輸入種類更多。同治年間，《滬遊雜記》云：「滬地自通商後，洋舶帶來各國花卉，奚止百數十種！名目甚繁，未能翻譯備載。」[273]

交易形式

據學者研究，唐代長安城裏有專供售花和賞花的市肆，最爲繁華而熱鬧者要屬牡丹花市，賣花者在街市空地上圍起籬欄，上面張著幕布，出售其從郊外運來，還帶著泥土的花樹。[274] 至宋代，賣花業有長足進步，出現了花團、花局、花行等名稱，汴京、洛陽、臨安、揚州、蘇州、紹興、成都等城市，也都有興盛的花市。[275] 明清江南城市皆有鮮花市，或在城內，或在城外。如南宋以來，杭州城內有花市巷，爲「作鬻花朵者」所居之處，明代時壽安坊兩岸，亦多賣花之

---

[267] 清・高士奇，《獨旦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柒輯第26冊，據清康熙年間刻本影印），卷三，〈海航載日本東洋茶花有紅白二種紅者正赤千葉白者花大如椀中含金粟與花瓣相錯開久微紅真異種也詩以紀事〉，頁5a。

[268] 清・陳金浩，《松江衢歌》（收入《上海歷代竹枝詞》），頁10。

[269] 清・尹會一、程夢星等修纂，雍正《揚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雍正十一年刊本影印，1975），卷一一，〈物產〉，頁5b-6a。

[270] 見《菊說》，頁16a-b。

[271]《清嘉錄》卷九，〈九月・菊花山〉，頁181-182。

[272]《滬城歲事衢歌》，頁17b。

[273]《滬遊雜記》卷一，〈外國花卉會〉，頁5。

[274] 參見何小顏，《花與中國文化》，頁273。

[275] 參見前書，頁273-274；魏華仙，《宋代四類物品的生產和消費研究》，頁216-219。

家。[276] 揚州自宋代以來，城外禪智寺、城中開明橋，皆有花市；清代新城北隅牌樓口之天福居，亦有花市。乾隆年間，梅花嶺、傍花村、堡城、小茅山、雷塘等處專事栽培花卉的花院，也都「每旦入城，聚賣於市」。[277] 清人方桂曾詠揚州花市道：「揚州好，花市簇轅門。玉面桃開春綽約，素心蘭放氣氤氳。宣石衬磁盆。」[278] 至於南京，清代南京人家，元旦清供多插天竺、臘梅於瓶中，「每歲花市，至果子行街，多售此者，極一時之盛云」。[279]

明代蘇州的花市，主要在城外的虎丘。正德《姑蘇志》記載：虎丘「春日賣百花，更晨代變，五色鮮穠，照映市中。其和本賣者，舉其器；折枝者，女子于簾下投錢折之」；「五月五日賣花，勝三伏賣冰、七夕賣巧果」，花卉皆按季節而出，「喧于城中，每漏下十餘刻，猶有市」，[280] 足見當時虎丘花市之盛。嘉靖年間，葉權 (1522-1578) 談到商人詐騙曾云：「今時市中貨物奸僞，兩京爲甚，此外無過蘇州。賣花人挑花一担，燦然可愛，無一枝真者。」[281] 此段文字說及明代蘇州花市之詭詐，但花如何作假則記述不清。而即使其中多有詭詐，許多文人還是常自各地前往虎丘買花，如萬曆四十三年 (1615) 四月七日，李日華與兒子自嘉興秀水出發，九日未時泊虎丘，買得建蘭二叢，茉莉二本，夾竹桃、珍珠蘭各一本。[282]（明代花店，參見圖五）

清代虎丘山塘的鮮花交易依然相當盛。康熙年間，艾納居士《豆棚閒話》詠花樹店道：「海棠謝了牡丹來，芍藥山鵑次第開。柴梗草根人不識，造些名目任人猜。」詠盆景店云：「曲曲欄干矮矮窗，折枝盆景繞回廊。巧排幾塊宣州石，便說天然那哼生。」[283] 張英 (1637-1708) 亦有詩詠道：「虎丘偶見牡丹市，淺白深紅萬朵開。」又一首云：「吳市花兒半塘住，小山盆景索千錢。」[284] 喬崇

---

[276]《西湖遊覽志》卷一三，〈南山分脈城內勝蹟・衢巷河橋〉，頁189。

[277]《揚州畫舫錄》卷四，〈新城北錄中〉，頁80-81。

[278] 清・方桂，〈望江南十調〉，收入《揚州竹枝詞》，頁163。

[279] 潘宗鼎，《金陵歲時記》（南京：南京出版社標點本，2006），〈天竺臘梅〉，頁44；《歲華憶語》，〈看花〉，頁62。

[280] 正德《姑蘇志》卷一四，〈風俗〉，頁10a-b。

[281] 明・葉權撰，凌毅點校，《賢博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6。

[282]《味水軒日記》卷七，萬曆四十三年四月七日至九日條，頁454。

[283] 清・艾衲居士著，王秀梅點校，《豆棚閒話》（北京：中華書局，2000），第十則，〈虎丘山賈清客聯盟〉，頁83。

[284] 清・張英，《文端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9冊），卷一五，〈吳門竹枝詞〉，頁8a-b。

烈 (1661-?) 亦有詩云：「山塘人家花連楹，秣麗狹蘭清復清。亦有筠籃賣花朵，人來不作賣花聲。」[285] 乾隆年間，王芑孫亦指出虎丘山塘，「百貨萃焉，而花爲最」。[286] 其中，有些名貴花卉價格不低，買者自然需要多帶些錢，故顧瑤光《虎邱竹枝詞》云：「不辭煙雨費栽培，芍藥今朝大半開。客要買花須著眼，惜錢莫要買花來。」[287] 徐揚《姑蘇繁華圖》中，就繪有販賣四時盆景、各色花草的花樹店二家，分別座落在半塘橋墩和虎丘。[288]（參見圖六）道光年間，袁景瀾談到虎丘的花市云：

> 虎阜山塘多花市。居民以藝花為業，曉來擔負百花，爭集售賣。山塘列肆，供設盆花，零紅碎綠，五色鮮穠，照映四時，香風遠襲。街頭換賣戴花，婦女投錢，簾下折之。圃人廢晨昏、勤灌溉，辛苦過農事，終歲衣食之資賴焉。[289]

當時，蘇州的花樹店，「自桐橋迤西，凡十有餘家，皆有園圃數畝，爲養花之地，謂之園場」，[290] 即這些花樹店都有自己直營的花圃。凡是運來虎丘山塘的大小花卉，無不取得好的價錢，正如清人翁照 (1677-1755) 所說：「更憐一種閒花草，但到山塘便值錢。」[291] 趙翼也有同樣記載：「尋常一樣野花嬌，纔到山塘價更高。」[292] 鮮花交易的地點，在虎丘花園衖與馬營衖口，即所謂的「市花場」。每天清晨，曉鴉未啼，鄉間的花農，已將各自所種花果，肩挑或筐負而來，羣聚於花場。[293]

這類盆花的交易，常透過中間商促成。顧祿《桐橋倚櫂錄》記載，虎丘交易的花卉，「大抵產於虎丘本山及郡西支硎、光福、洞庭諸山者居半」，另外「有來自南路者，多售於北客；有來自北省者，多售於南人」。這些由南、北各地運來交易的花卉，「必經虎丘花農一番培植，而後捆載往來」。花卉之出入，俱由

---

[285] 清・喬崇烈，〈山塘竹枝詞三首〉，收入《歷代竹枝詞》第1冊，乙編，頁749。
[286]《淵雅堂全集・惕甫未定稿》卷一，〈山塘種花人賦有序〉，頁6a。
[287] 顧瑤光，《虎邱竹枝詞》（收入《歷代竹枝詞》第1冊，乙編），頁912。
[288] 參見范金民，〈清代蘇州城市工商繁華的寫照——《姑蘇繁華圖》〉，《史林》2003.5：115。
[289]《吳郡歲華紀麗》卷三，〈三月・虎阜花市〉，頁134。
[290]《桐橋倚櫂錄》卷一二，〈園圃〉，頁7a-7b。
[291] 同前文，頁8b。
[292]《甌北集》卷二六，〈吳門雜詩〉，頁562。
[293]《桐橋倚櫂錄》卷七，〈場衖〉，頁15a；卷一二，〈園圃〉，頁10b。

店主經手，至於春夏蘭蕙、臺灣水仙，則另有專賣店。花樹店的店主人，「俱如牙戶之居間」，撮合生意後對這筆交易抽取一成的佣金，稱爲「用錢」。[294] 另據張春華《滬城歲事衢歌》記載，上海花市也有這樣的居間人：「郭稍東而南，幾於比戶皆售花者，名花市。清曉，村人肩花入市，有司其價值者，兩造具備，衡其輕重、別優劣以定價，而於中取百一之利，名花主人家。」[295] 上海這種「花主人家」，應爲花卉買賣的牙行，僅抽取百分之一的牙錢。

除了連根帶土的鮮花市之外，蘇州虎丘也有專門交易折枝花卉，以便人們「插膽瓶盂缽之玩」的供花市，其市場在半塘怡賢寺一帶，太陽一出即散。[296] 虎丘還有一種專售鬢邊香的花市。鬢邊香俗稱爲戴花，春天所賣有紅綠白梅、草蘭、蕙蘭、碧桃、壽李、薔薇、玫瑰、棣棠、木香、野木香、杜鵑、藤花，夏天則梧桐花、玉堂春、金雀、珠蘭、石榴、梔子、茉莉、水木犀、金絲桃、夜來香、醒頭草、五月菊、藍菊、紫萼，秋天則有鳳仙、建蘭、木犀球、菊花、橘花，冬天則有山茶、臘梅、芙蓉、桔梗花，交易皆以朵算錢。市場除玫瑰、茉莉、珠蘭市在花園衖口花場上外，其餘皆在半塘花市。[297]

又有一種專賣籃花的花市，這種籃花如木香、玫瑰、山茶、蠟梅、梅花、桃花，皆可扦於籃上，而以茉莉花爲盛行，故俗呼籃花爲茉莉花籃。花籃有兩種，一爲草椶結成，一以秦嘉州濺色氂尾爲之。籃內放置磁盂及琉璃盃，可以養魚花，大者籃內可燃燈，俗呼燈花籃。所扦花朵大者不祇六、七層，小者亦有四、五層。每一層，花農用銅線爲花骨，再作成「絡索之狀，搖搖下垂」。或有用各種粗細的麻骨，以銅絲紮成三足蟾蜍、蝴蝶雙飛、元寶、鞭劍、匾額的形狀，再簪花於上頭。所有籃花，皆由花農自行設計，無有定格。這種籃花市，在山塘或野芳濱，「豪民富賈，楚館秦樓，多爭買之」，買到後，「晨懸斗室，昏縛羅幃，夢醒花放，尤繁華中之色香世界也」。[298] 籃花爲蘇州特有，外人見之恒有文字載及，錢塘張雲璈 (1747-1829) 就曾說：「吳中賣花，多以珠蘭、茉莉結成小籃，精麗無比。」[299] 在此要附帶一提的是，花的價值有時不在花的本身，而

---

[294]《桐橋倚櫂錄》卷一二，〈園圃〉，頁8b。
[295]《滬城歲事衢歌》，頁12b。
[296]《桐橋倚櫂錄》卷一二，〈園圃〉，頁11b-12a。
[297] 同前文，頁11a。
[298] 同前文，頁12a-b。
[299]《簡松草堂文集》卷八，〈茉莉詞〉，頁7a。

在巧思與創意。嘉慶十三年，趙翼〈草花〉詩曾談到：「細碎花紋密似編，開來不值半文錢。若教巧匠金絲製，價又高懸索百千。」[300] 可見即使是不亮麗的草花，祇要經過巧匠一番設計或搭配，還是可以賣得高價。虎丘花農的籃花創意，自然更是如此。

另外，清代江南城市的花市上也賣桂花毬。乾隆年間，張塤 (1731-1789) 曾云：「虎丘山塘，結桂花毬賣之，供閨閣之妝。」[301] 顧瑤光《虎邱竹枝詞》有詩詠道：「種花人家花滿樓，種花女兒最風流。偶起微風拂簾子，鬢雲遺落木樨毬。」[302] 嘉慶年間，蔡雲也說蘇州賣花者，「以線結桂粟成毬，婦女戴之」。[303] 吳兆鈺《姑蘇竹枝詞一百首》亦有詩云：「小山叢樹方矜貴，帽子秋來未探頭。唯有船娘雲鬢麗，早黃先帶木樨毬。」[304] 除了蘇州，其他城市也有此風。乾隆四十年，黃霆《松江竹枝詞》詠道：「雲鬢巧綰桂花球，窄袖輕衫正及秋。」[305] 陳灝〈惠山竹枝詞〉云：「清華水木不知愁，寄暢園亭接素秋。一種天香爭愛惜，綵絲齊結桂花毬。」[306] 又，《揚州畫舫錄》記四橋以東的錦鏡閣，「是地桂花極盛，花時園丁結花市。每夜地上落子盈尺，以綵線穿成，謂之桂毬」。[307] 後來，揚州附近的泰州也流行桂花毬，晚清朱餘庭《海陵竹枝詞》詩註云：「桂花毬惟秦淮有之，近來海陵盛行。」[308]

清代揚州花販在買花時，常先至花田選花。趙懷玉 (1747-1823) 就談到揚州「買菊者於未開時，先至圃中，以小印印菊葉，辨其種類」。[309] 道光年間，顧祿也記及蘇州花圃賣花，「先有販兒以及花樹店人，擇其佳種鬻之，以求善價」。[310]

---

[300]《甌北集》卷五〇，〈草花〉，頁1285。

[301] 清・張塤，《竹葉庵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49冊，據清乾隆五十一年刻本影印），卷一七，〈葑亭招同覃溪心餘載軒兩峰看桂花得淮南二字禁用小山故事金粟木樨等字二首〉，頁3a。

[302] 顧瑤光，《虎邱竹枝詞》（收入《歷代竹枝詞》第1冊，乙編），頁910。

[303]《吳歈百絕》（收入《歷代竹枝詞》第4冊，己編），頁2967。

[304]《姑蘇竹枝詞一百首》（收入《歷代竹枝詞》第5冊，辛編），頁3971。

[305] 黃霆，《松江竹枝詞》（收入《歷代竹枝詞》第2冊，丙編），頁1315。

[306] 清・陳灝，〈惠山竹枝詞〉，收入《歷代竹枝詞》第5冊，辛編，頁4026。

[307]《揚州畫舫錄》卷一二，〈橋東錄〉，頁284。

[308] 朱餘庭，《海陵竹枝詞》（收入《歷代竹枝詞》第4冊，己編），頁2892。

[309] 清・趙懷玉，《亦有生齋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69-1470冊，據清道光元年刻本影印），詩卷二四，〈味蓼居看鞠歌〉，頁17b。

[310]《桐橋倚櫂錄》卷七，〈場衖〉，頁15a；卷一二，〈園圃〉，頁10b。

有些花販則指定個別園圃，爲其採買訂做各式成品，再轉售予妓院或閨秀。民初徐謙芳 (1886-1950) 的《揚州風土記略》，載述清末揚州城南門外的許多花院，栽植茉莉、珠蘭、白蘭、香橼花之類花卉，「專爲販戶採買，製成花表等品，轉售平康樂戶，及閨閣媛秀，凡四時無間」；另外，也「穿花茶、供碟、花籃，製爲三星桌圍等物，以備禮品」。[311]

不少花農則將花樹運至花市上，與花販直接交易。花販購得花卉之後，再到其他地點販賣，或沿街兜售。如清代蘇州的花販，至半塘怡賢寺一帶，買到插花用的供花之後，多集中在閶門、渡僧橋、釣橋及元妙觀門口，寄人廡下求售。[312]至於戴花，小販在虎丘花市買得後，先在花場左右茶肆喝茶，順便「細細扦插」，其後乃「成羣入市，攔門吟賣，紫韻紅腔，宛轉堪聽」。[313]

有些花農則直接擔著鮮花至城裡販賣。這種賣花郎，蘇州自明初以來即有之。元末明初，高啓 (1336-1374)〈賣花詞〉云：「綠盆小樹枝枝好，花比人家別開早。陌頭擔得春風行，美人出簾聞叫聲。移去莫愁花不活，賣與還傳種花訣。餘香滿路日暮歸，猶有蜂蝶相隨飛。」[314] 可以看出，蘇州種花郎沿街叫賣，婦女聞聲揭簾買取；其所賣爲連根者，故亦教導買家如何照顧花木。迄至清代，這種場景依然可見。乾隆年間，章法 (1693-1769) 談到：蘇州「四時花朵，朝朝來賣。俱用綱絲巧紮奇式，戴之則步步生動」。[315] 陳祁言上海賣珠蘭、茉莉、夜來香者，「或以銅絲穿插，或以紗囊盛貯，沿街喚售」。[316] 道光年間，顧祿也談到蘇州婦女喜簪茉莉，花農所植茉莉花蕊連蒂者，皆專供婦女簪戴之用，以花籃裝著，沿門叫賣。[317] 當時，揚州花農也常沿路賣花，所賣的茉莉花，用「銅絲扭成多鬚，上插大茉莉，朵戰戰然」，俗稱茉莉顫。[318]（花販沿路賣花之情景，參見圖七）

---

311 徐謙芳，《揚州風土記略》（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卷中，〈風俗〉，頁50。

312《桐橋倚櫂錄》卷一二，〈園圃〉，頁11b。

313 同前文，頁11a。

314 明・高啟著，清・金檀輯注，徐澄宇、沈北宗校點，《高青丘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二，〈賣花詞〉，頁85。

315 清・章法，《蘇州竹枝詞》（收入《江蘇竹枝詞集》），頁526。

316 清・陳祁，《清風涇竹枝詞續唱》（收入《歷代竹枝詞》第2冊，丙編），頁1448。

317《吳郡歲華紀麗》卷六，〈六月・茉莉花籃〉，頁213-214。

318《邗江三百吟》卷六，〈茉莉顫〉，頁7b。

在四季當中，花卉銷售與節慶的關係相當密切，過年前後尤其是商機最旺之時，新年過後生意就要減色。厲秀芳 (1794-1867)《真州竹枝詞》有詩述揚州花店道：「老幹盆中手自栽，孤芳待聘嘆無媒。只今不敢高身價，過此恐無人再來。」[319] 有時花市還與廟會結合。其中，與妓女有關的乃是四月十四日呂洞賓生日。在每年呂洞賓生日時，蘇州妓女就都趕往福濟觀買花，這時觀內到處是花擔。清初，沈朝初〈憶江南〉詞有云：「蘇州好，生日慶純陽。玉洞神仙天上度，青樓脂粉廟中香，花市繞回廊。」詩註云：「四月十四日爲純陽生日，滿城妓女俱至廟中兩廊市花，謂之神仙花。」道光年間，這種情況依昔，虎丘花農皆趁此機會，競擔小盆草木本鮮花，赴福濟觀求售。[320] 妓女與廟會結合，也爲花農創造不小的利市。

在明清江南的城市，花卉消費的主要階層是官紳、富商與文人，而對妓女來說，花卉除了可以裝飾閨閣之外，也是重要的妝扮之物，因此其對各色花卉的需求亦不小。萬曆中葉，謝肇淛嘗言：「今時娼妓佈滿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他窮州僻邑，在在有之」。[321] 明清時期，南京的秦淮名妓、揚州的瘦馬、蘇州的吳姬、上海的女校書，即其名聲響亮者。[322] 故這些城市的妓院附近，常聚集許多賣花人。晚明南京秦淮河兩岸的妓院，就是賣花者常走動的地方。清朝初年，錢陸燦 (1612-1698)〈秦淮竹枝詞〉，曾有「滿城秋意桂花開，賣遍河房不用栽」之語。[323] 余懷 (1616-1696) 也回憶道：

> 裙屐少年，油頭半臂。至日亭午，則提籃挈榼，高聲唱賣逼汗草、茉莉花，嬌婢捲簾，攤錢爭買，捉膀撩胸，紛紛笑謔。頃之，烏雲堆雪，竟體芳香矣。蓋此花苞于日中，開于枕上，真媚夜之淫葩，殢人之妖草也。[324]

茉莉雖被余懷視爲淫葩，但清代江南妓女依然喜歡簪戴。乾隆年間，《續板橋雜記》記秦淮河畔，「日初過午，賣花聲便盈街市」，賣花郎售賣茉莉、珠蘭，提

---

[319] 清・厲秀芳，《真州竹枝詞》（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鉛字標點本，1958），〈花店〉，頁117。

[320]《清嘉錄》卷四，〈四月・神仙花〉，頁98。

[321]《五雜俎》卷八，〈人部四〉，頁157。

[322] 關於明清的娼妓，參見王書奴，《中國娼妓史》（上海：生活書店，1934），頁193-225, 261-317。

[323] 清・錢陸燦，〈秦淮竹枝詞〉，收入《歷代竹枝詞》第1冊，乙編，頁482。

[324] 清・余懷著，李金堂校註，《板橋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上，〈雅遊〉，頁13。

著籃筐、挈著榼子，與余懷所記無異，至近年更出現花籃，「綴以銅絲，幻成魚籃、飛鳥」，可以懸於帳中，至昏黃之時花朵齊開，「酒醒夢迴，芳馨橫溢，和以氣肌薾澤，如遊眾香國中」。[325] 嘉慶年間，《畫舫餘譚》記南京四季名花，「朱門繡戶尚未之見，而曲中諸麗人已早有插帶者」，蓋緣妓女們不惜重價，向花匠先預訂，「故能爭先購致，以助新妝」。[326] 另據資料記載：「茉莉、珠蘭，爲秦淮兩岸人家夏令一大銷場。當夫炎日西匿，水閣帘開，兩岸香氣，薰人欲醉，皆此花氤氳之氣。」[327] 蘇州方面，據嘉慶年間《吳門畫舫續錄》云：蘇州名妓簪鬢尚鮮花而厭珠翠，花匠常於新春時，取牡丹有花無葉者，編以銅絲，雜綴碧桃、蘭蕙諸花，供妓女鬢邊插戴，「鴛瓦雪深，鴉鬟春暖，過客遇之，幾疑身入蓬山閬苑中」。[328] 道光年間，袁景瀾〈山塘賣花詞〉也描述妓女買花之景象：

> 一肩花壓紅千朵，擔入東風轉婀娜。蜂蜨隨香上下飛，路旁時有殘英墮。喚賣聲傳繡闥邊，吳姬爭出盡簾前。揀得數枝簪兩髻，袖中拋與沈郎錢。[329]

其《姑蘇竹枝詞》云：「丁家巷在閶門南濠，爲平康聚處」，山塘花農沿門喚賣茉莉，女子於簾下投錢買之。[330] 當時，蘇州不論大家小戶，婦女多喜簪花，歌伎與船孃尤其一日不可或缺，有花販子每天在門口守候，「以爲曉粧之助者，計月論值」，俗稱爲包花。[331] 上海方面，據咸豐十年 (1860)《海陬冶遊錄》記載，在花草濱、三牌樓一帶多有花肆，「異蕊名葩，靡月不有，美人頭上，頗不嫌寂寞」，夏秋之交，「建蘭素蕙，入座清芬」，而茉莉、桂花結爲花毬，名妓買後懸之碧紗幮中，媚香四溢，「薄醉初醒，夢魂俱適，溫柔鄉洵有佳趣」。[332] 除了妓院之外，茶寮與酒家也是花販子常出現之處。晚清朱文炳《海上竹枝詞》有詩云：「提籃喚賣白蘭花，纔入茶寮又酒家。」[333] 妓女們買得鮮花除了擺設

---

[325] 清・珠泉居士，《續板橋雜記》（收入《章臺紀勝名著叢刊》第2種），頁2。
[326] 清・捧花生，《畫舫餘譚》（收入《章臺紀勝名著叢刊》第5種），頁17。
[327]《歲華憶語》，〈看花〉，頁62。
[328]《吳門畫舫續錄》，頁16。
[329]《吳郡歲華紀麗》卷三，〈三月・虎阜花市〉，頁136。
[330] 袁學瀾，《姑蘇竹枝詞》，頁13a。
[331]《桐橋倚櫂錄》卷一二，〈園圃〉，頁11a-b。
[332] 清・玉魷生，《海陬冶遊錄》（收入《章臺紀勝名著叢刊》第12種），卷上，頁4。
[333] 清・朱文炳，《海上竹枝詞》（收入《歷代竹枝詞》第5冊，庚編），頁3647。

之外，多半簪戴於髮髻之上，而據王廣業 (1799-?) 指出，揚州一帶風俗，婦女鬢戴茉莉花有斜正之別，「以茉莉花旁插爲良婦，蕩子婦正帶一枝」。[334]（妓女簪花，參見圖八）

有趣的是，有些城市還出現租花的形式。萬曆年間，于若瀛在南京爲官時，宅中空地到處是花。他在南京五年，先後搬了五次寓所，「官閒得買花樹爲娛，而又乏買花之錢，乃減其值，暫買之鬻花者，或乞諸友人。一種開盡，即持去更易一種，歲以爲常」。他說：花「皆非我有，而我得縱觀之，又無收藏之勞，惟金陵爲然」。[335] 引文中提到的「暫買」，其實類似租賃。〈金陵花品詠〉談到芍藥又說：「金陵鬻者，一盆數頭，緗蕊攢挺，燁燁奪目。既萎仍歸其根，蓋欲還諸土，以蘄來歲再鬻，值亦不厚索。」[336] 花匠乃是暫時將花借他觀賞，花凋謝即請其送回。南京花匠爲求薄利多銷所想出的租花方式，可說是海內所少見。

至清代，蘇州、杭州等地也出現租花。嘉慶年間，沈復曾說其生平「喜摘插瓶，不愛盆玩。非盆玩不足觀，以家無園圃，不能自植；貸于市者，俱叢雜無致，故不取耳」。[337] 可見蘇州的花卉可以租賃，但有意緻者不多。道光年間，厲秀芳提到揚州菊花有二種，種於地上者稱爲「站菊」，植於盆中者稱爲「霉扦」。後者多爲花匠種以取利，擔送至各富家擺放，花匠每於數日後來，將開足者取出，另補入含苞待放者，室中菊花可以延續一個月。[338] 這也是一種租花的方式。在蘇州、揚州之外，杭州也有這種方式。同治年間，《杭俗遺風》云：「當九、十月之交，五色洋菊齊開，有花園匠紮縛各式大小盆景，出租與山上、山下茶肆擺設，供人賞玩。」[339] 清末《杭俗怡情碎錦》記菊花云：「衙署或富家，四時花園中，租售包送，收過換新。」[340] 看來租花之舉在清代江南的城市已相當普遍。

另外，據乾隆年間《揚州畫舫錄》記載，揚州花匠還提供架花佈置的服務，花架有一面、夾堂之分，方罫、象眼諸式，用來圍護花樹，謂之架花。花架以見

---

[334] 清・王廣業，《海陵竹枝詞》（收入《歷代竹枝詞》第3冊，戊編），頁2165。

[335]《弗告堂集》卷四，〈金陵花品詠〉，頁3a-b。

[336] 同前文，頁8b-9a。

[337]《浮生六記》卷二，〈閒情記趣〉，頁36。

[338]《真州竹枝詞》卷首，〈真州竹枝詞引〉，頁43-44。

[339] 清・范祖述撰，民國・洪如嵩補輯，《杭俗遺風》（杭州：六藝書局，1928），〈時序類・茶坊菊景〉，頁25。

[340]《杭俗怡情碎錦》，〈時序類・九月〉，總頁15。

方計算工價，材料則用杉槁、楊柳木條、薰竹竿、黃竹竿、荊笆、籜竹片、花竹片、椶繩。花樹價值有其常價，保固亦有其期限。大部份花樹皆保固三年，保固二年者爲西府海棠，不保固者則如大柏樹、大羅漢松、頭二號馬尾松、大白菓樹、小山裏紅、小玫瑰、榛子菓、歐子菓等花樹。運費方面，送往京師者，以車載數量論價；城內則每一車收銀二錢，出城十里以內加收銀一錢，十里以外，每里加收銀二分。如以人夫抬運，照人數多寡給工錢。湖上樹木，多自堡城送來，無水路可通船，運價照人數多寡收費之例。[341] 從架花有保固期限看來，其經營模式已相當專業。

上海花匠亦有類似服務。道光年間，《滬城歲事衢歌》提到：「藝菊待售者，花時呼之來，度庭宇之寬窄遍供之，較自種尤便」。其中，用盆石栽者約十之三、四，其餘皆用瓦筒。供瓦筒必在寬敞之處，先將瓦筒箍以篾繩，再以細竹扶住，極高者達五、六尺。其下以欄杆遮蔽，欄內先列短者，再列高者，層層而上。花則放於瓦筒頂上，大小如盆碗大，每株開三、四花，「間其色如霞如錦，光彩奪目」。[342]

結語

英國人類學家 Jack Goody 在觀察非洲、歐洲與亞洲各地花卉使用的差異時，曾談到並不是所有時段、所有地方的人都喜歡花。非洲相對於歐洲、亞洲，對花卉種植就興趣缺缺。而歐洲在黑暗時代，花卉栽培也呈現倒退，即使在宗教改革時期，也限制花卉的使用，這種情況要到文藝復興以後才有較大轉變。然而，隨著花卉種植的商業化與全球化，若干人士對於花卉的奢侈情節還是存在。[343] 同樣地，在中國歷史上，也不是所有朝代、所有地方都有花卉文化，花卉賞玩之出現亦非自然而然。如明清華北除京城之外，花卉賞玩之風就比不上江南的城市，其原因可能涉及氣候、經濟條件與文化創意等差異。明清江南花卉賞玩之盛，與自然條件之適宜、有閒階級之繁夥、生活美學之積累、商品經濟之發

---

[341]《揚州畫舫錄》卷一七，〈工段營造錄〉，頁417-418。

[342]《滬城歲事衢歌》，頁17b-18a。

[343] 參見 Jack Goody 著，楊惠君譯，《飲食與愛情：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頁277-281。其對於歐、亞、非各洲間花卉文化差異的全般討論，見所撰 *The Culture of Flow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一書。

達，以及栽培技術之創新，自有著彼此共生的關係。

早在明代以前，花卉與城市生活即已產生關係，明清江南城市之所以特別，在於其不再是孤島式的發展，而是蜘蛛網式的交叉互動，而且在栽培技術上呈現動態的競爭。以本文所談到的南京、揚州、蘇州、杭州與上海而言，除各自生產其所需的花卉之外，彼此之間的貿易也相當頻繁。就園藝栽培而言，十五世紀中葉以前，江南花卉種植以南京、蘇州、揚州、杭州較盛，十八世紀以後上海也繼起直追。在這幾個城市之中，蘇州是最大的集散地，本身所生產的花卉也輸往上海、南京、揚州等地。由於花卉種植的經濟利益甚高，蘇州等城市周邊的許多農民遂轉而種花，也引發若干士人對於棄本逐末的疑慮。而且，花圃與花商的關係日益緊密，十八世紀末以降，蘇州與上海均出現了花商公所。

花農在城郊所種植的花卉，主要爲供應城市有錢人消費，爲了吸引客源與提高附加價值，花匠莫不試圖改良品種，培植出更好的花色或異種，或者利用其他技術克服氣候條件，栽培出異地的花卉。甚至想辦法超越其他地方，如十六世紀末，水仙栽培技術以嘉定第一，至十七世紀中葉，南京則已經取而代之。晚明時，江陰也取代蘇、松而成爲牡丹的栽培中心，但至清中葉上海又超越江陰。明清時期，盆景更是花卉市場上最重視的商品，往往可以賣得極高的價格，也非中下階層消費得起。由於其附加價值高，南京、蘇州、揚州等地，均有不少士人投入栽培，不過絕佳的作品常需數十年才能雕琢好。另外，在十八世紀末，塘花法自北京引入，使揚州、蘇州、上海等地，許多春天才能上市的花卉（如牡丹、芍藥等），在春節時已經成爲熱賣的商品，其價格相對也較高，種者從而可以獲致更好的收益。

江南城市的花卉市場，自十六世紀初起日趨蓬勃，交易圈由原來城郊供應城市，進而一百公里內的花卉也輸入到較大的城市（如杭州）。而透過四通八達的水運交通，城市與城市之間形成花卉的交易網絡，至十七世紀初，蘇州的盆景甚至賣到二百公里外的揚州，與二百五十公里外的南京。相對地，許多外地的花卉，也因爲栽培技術的提升，與商品交易的發達，在市面上不難見到。十七世紀初，江南城市的賣花業大興，文人曾驚嘆無花不賣，而此也爲小孩、老嫗提供了不少就業的機會。十八世紀以後，透過海運的聯結，廣東與福建的茉莉、蘭花也直接進入江南城市，其市場規模與交易範圍更大，蘇州的花卉也銷往廣州，天津的花卉亦南運而來，形成多向而非單向的沿海貿易網。此外，東洋與西洋的花卉也透過海運傳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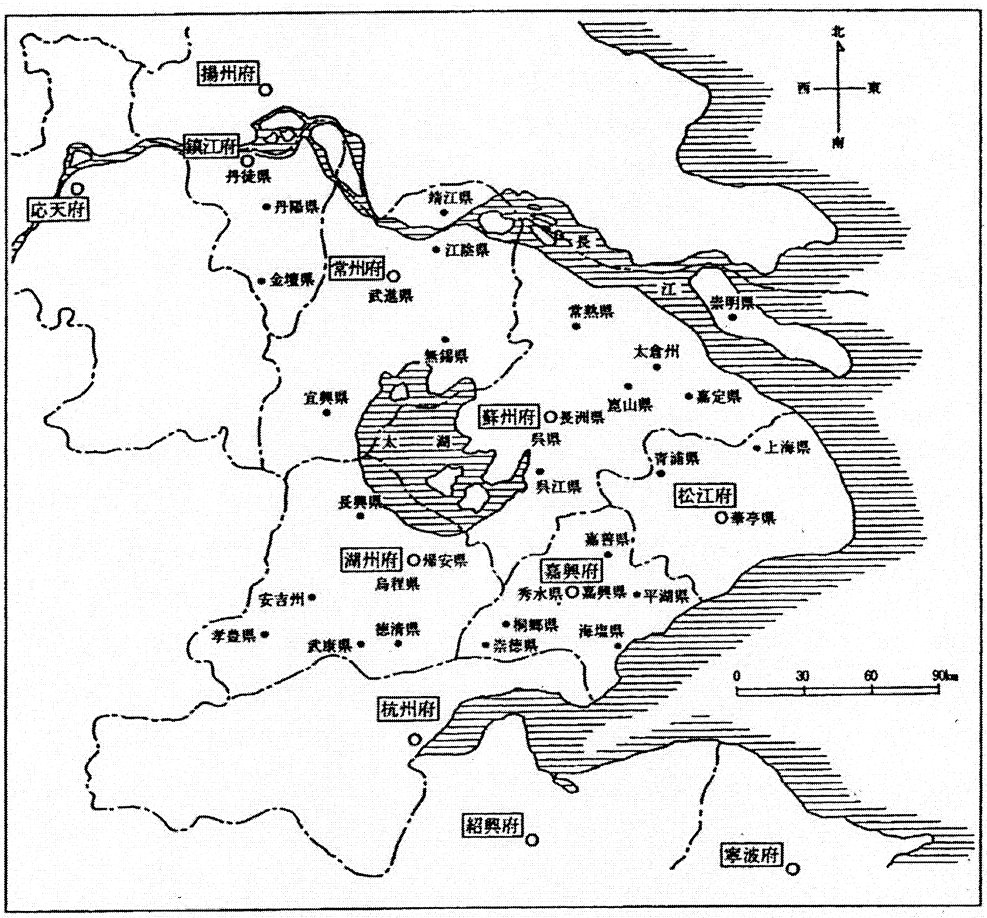
清代江南城市的花卉交易分爲幾個類型，其一爲商人先至花田訂花，花農再送至城中交貨。第二種是花農將花卉運至花市，花卉商人直接向花農購取。交易過程中，存在撮合買賣的中間商，從中收取佣金。另外，還有一種方式是，花卉商人再將花轉賣給較小的花販子。當然，市面上也有花農直接挑花沿街叫賣。清代蘇州花卉市場，分爲賣盆花、插花、花籃、簪花四種，地點各有不同，其中盆花的市場最大，插花次之，主要提供官宦、富豪或店舖擺設裝潢之用。後兩者的對象主要是婦女，尤其是妓女。基於婦女對簪花的需求，還有販子採取送花包月的方式。另外，沿街叫賣的花販，往往也吸引女子揭簾購買。在花卉交易上，明代南京曾出現租花的方式，清代蘇州、杭州也有這樣的例子。此外，江南花匠也多代客佈置花木，揚州花匠甚至提供保固的服務。

整體而言，明清江南城市的園藝栽培，在需求日增的情況下，不斷孕育出新的品種，花色也越來越多，特種花卉不斷推陳出新。而在園藝栽植盛況的背後，實有著士大夫或商賈對花木的強烈感官慾求。士人在這個市場當中，尤爲盆景風格與流行花卉的領航者，基於其對特種花木與盆景格調的品賞，花木栽培與市場需求可能隨之變化。而藉由栽植技術、商業活動與賞玩文化的互動，花卉交易的形式也越來越多元，這也是前此所未有的。

（本文於民國九十六年四月十九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文初稿宣讀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哈佛大學東亞系合辦之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ty Life in Jiangnan: from Late Imperial to Early Modern China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October 6-7, 2006)，感謝 Ellen Widmer 教授的評論與葉文心、李孝悌、奚密、王鴻泰、李尚仁等教授的意見。其後，王正華、梅慧玉兩位教授，也曾提出值得思考的問題。又，兩位審查人指出本文缺失，並提供修改建議。於此，一併致上誠摯的謝意。



圖一　明代江南圖

（轉引自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の研究》

〔京都：同朋舍，1988〕，書首〈明代の江南デルタ概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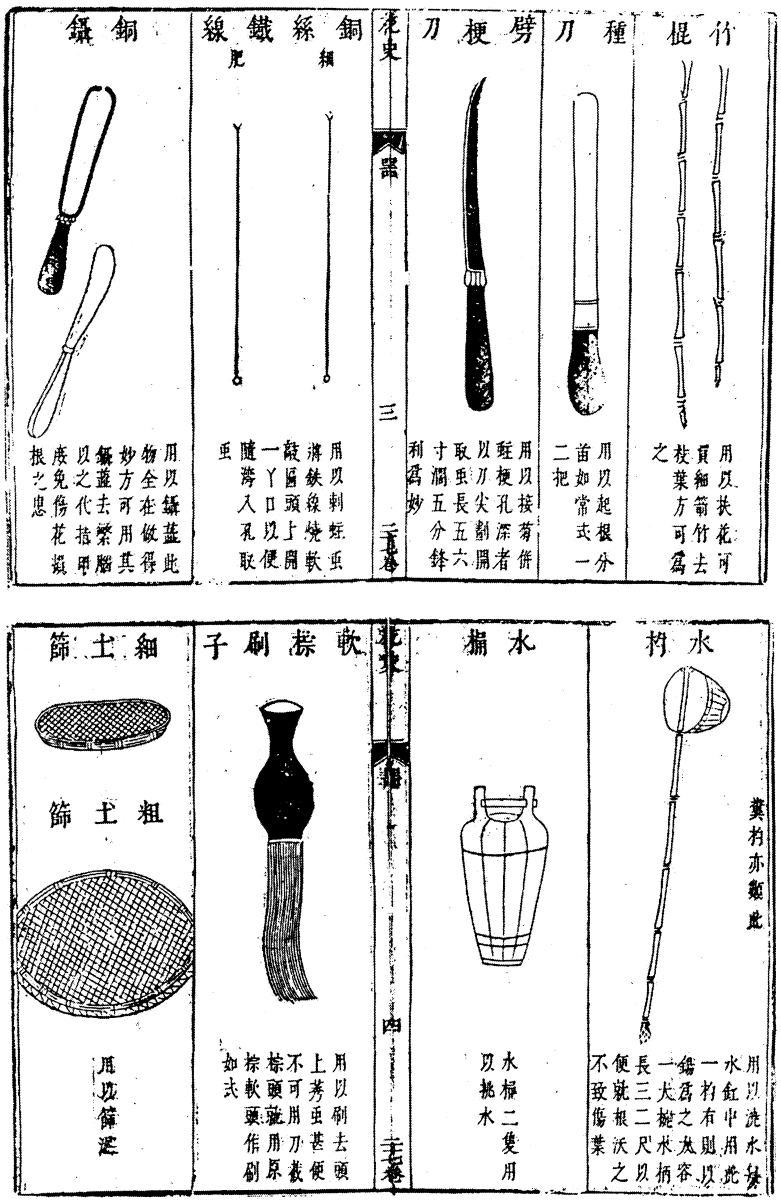
圖二　方薰《太平歡樂圖》賣各色花木圖

（方薰繪，《太平歡樂圖》，頁33a, 36a, 46a, 48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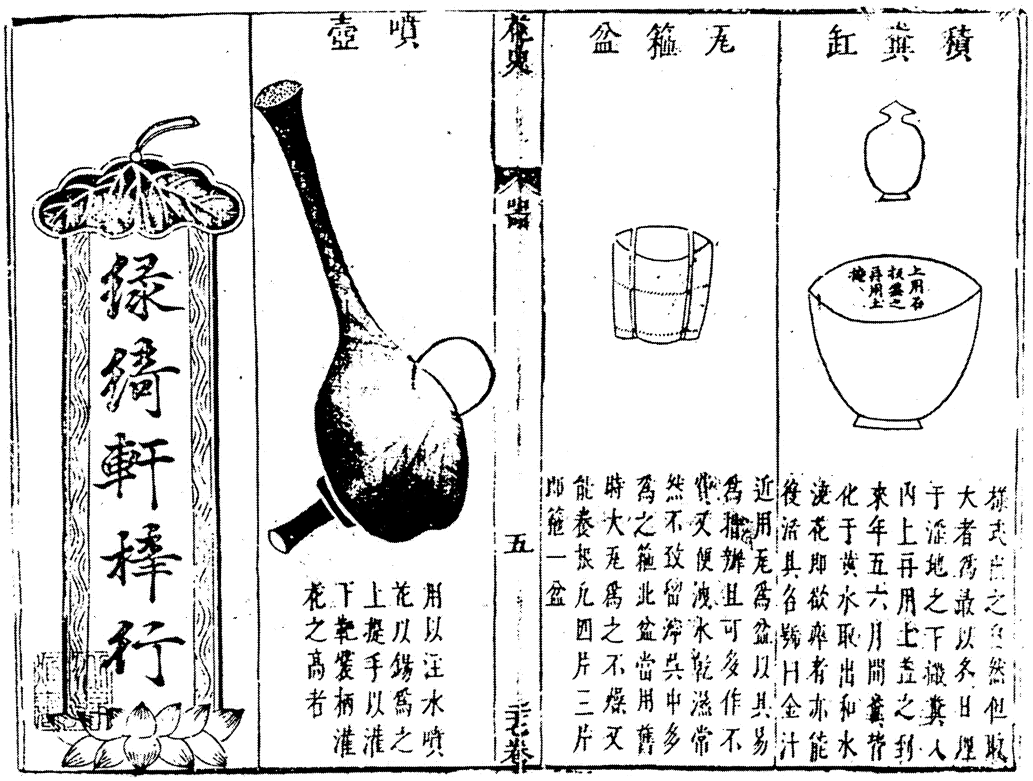
圖三之一　《花史左編》蒔花器具圖

（明・王路，《花史左編》〔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82冊，據明萬曆四十六年綠綺軒刻本影印〕，卷二七，〈花之器〉，頁1a-2b）



圖三之二　《花史左編》蒔花器具圖

（《花史左編》卷二七，〈花之器〉，頁3a-4b）



圖三之三　《花史左編》蒔花器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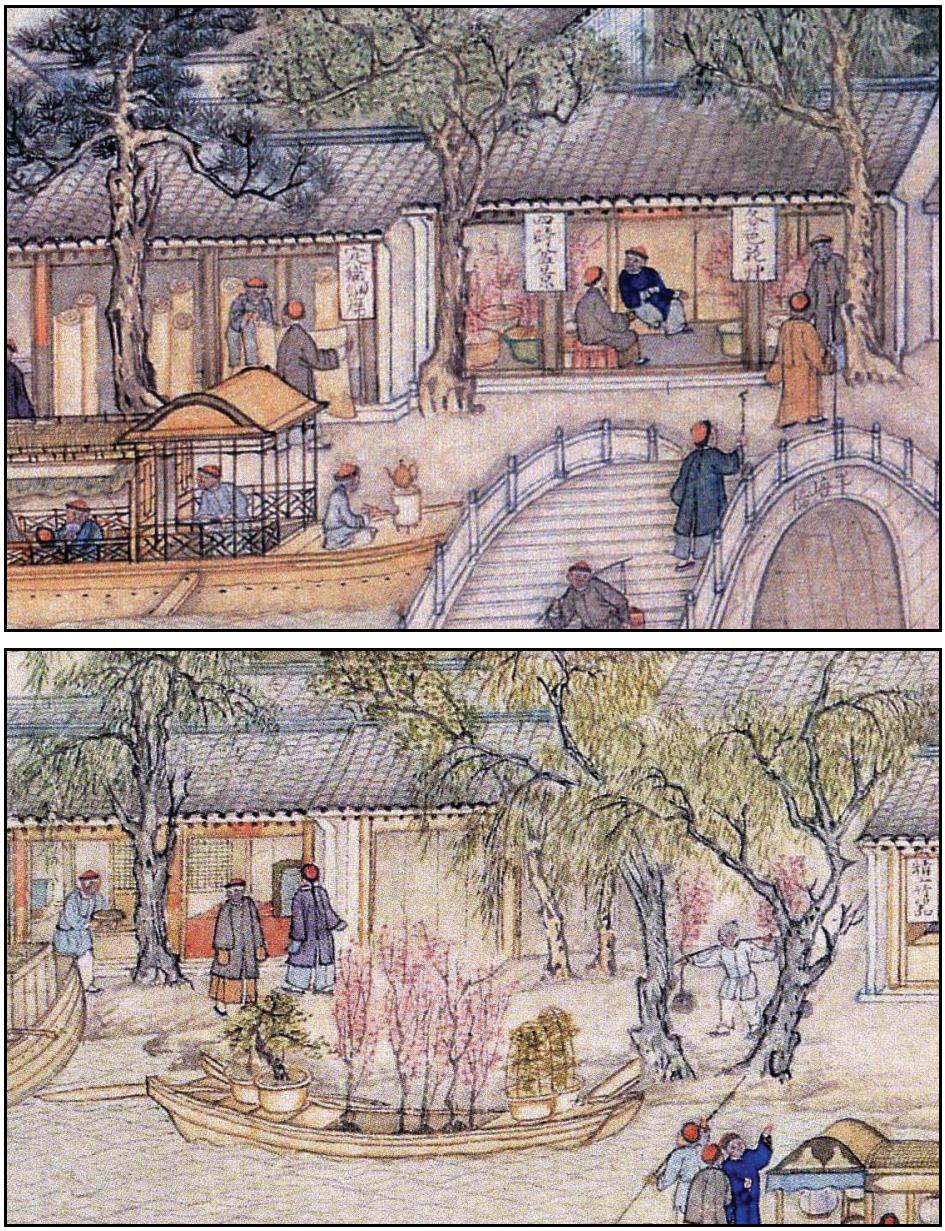
（《花史左編》卷二七，〈花之器〉，頁5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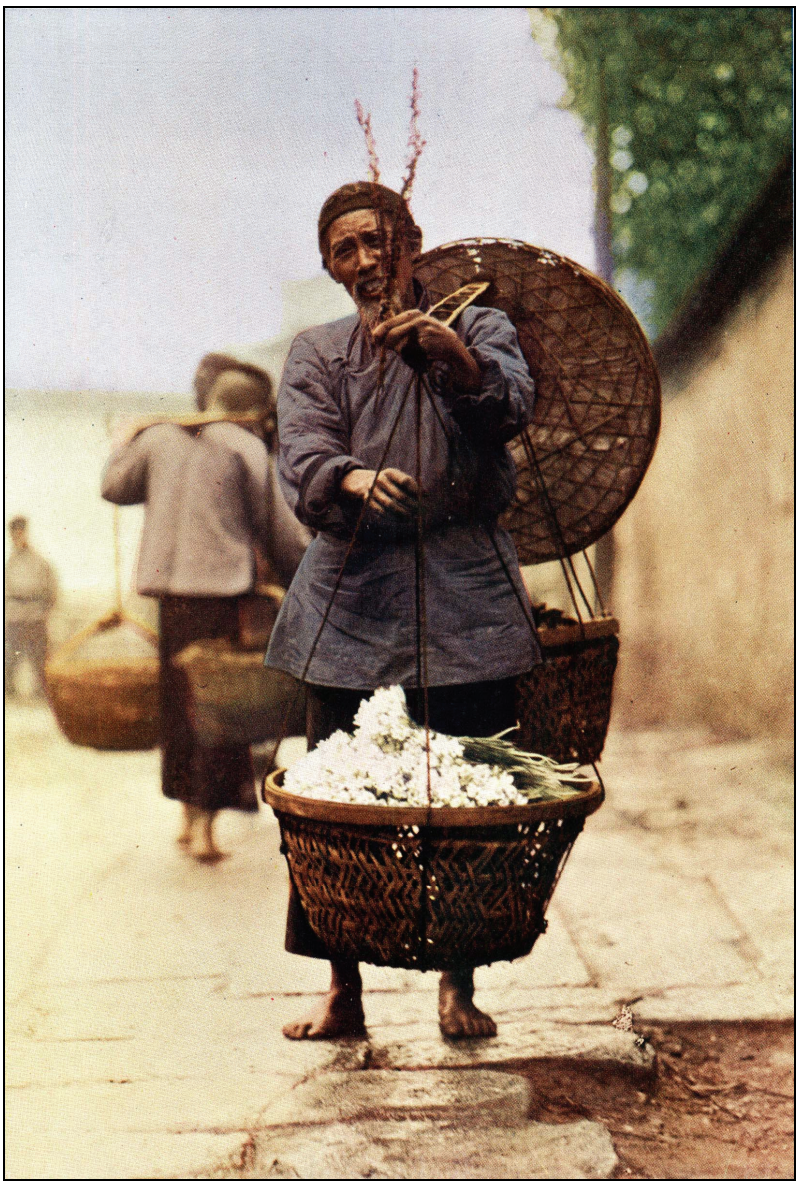
圖四　《吳友如畫寶》郭橐駝圖（清・吳友如，《吳友如畫寶》〔上海：上海古籍書店據清光緒三十四年上海文瑞樓書局石印本影印，1983〕，第一集，《古今人物圖下》，〈養樹得養人術〉，頁12）



圖五　仇英《清明上河圖》花肆圖（明・仇英繪，《仇英畫集》〔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圖9，〈清明上河圖局部三〉）



圖六　《姑蘇繁華圖》中的花樹店與賣花船。上圖花樹店的招幌上寫著「各色花艸」、「四時盆景」。下圖有一花農挑著花樹往賣花船方向走。（據清・徐揚繪《姑蘇繁華圖》〔北京：文物出版社影印，1999〕改製）



圖七　福州賣花人。此圖雖係福州賣花者，但江南之情景或亦相當。
（仲摩照久編，《世界地理風俗大系・第三卷・支那下》
〔東京：新光社，1930〕，頁113）



圖八　簪花的妓女

（仲摩照久編，《世界地理風俗大系・第三卷・支那下》，書首冊頁）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班固著，《漢書》，傅東華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62。

唐・柳宗元，《河東先生龍城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八編》，臺北：新興書局，1975，第1冊。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9。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宋・周密撰，《齊東野語》，張茂鵬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

宋・施諤纂，淳祐《臨安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七年 (1881)《武林掌故叢編》本影印，1983。

宋・陶穀，《清異錄》，收入《寶顏堂祕笈》，臺北：藝文印書館據明萬曆年間繡水沈氏尚白原齋刻本影印，1965，第8函。

宋・龔明之撰，《中吳紀聞》，孫菊園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元・陳旅，《安雅堂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據抄本影印，1970。

元・陸友仁，《吳中舊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590冊。

明・于若瀛，《弗告堂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第46冊，據明萬曆三十一年 (1603) 刊本影印。

明・仇英繪，《仇英畫集》，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

明・文震亨，《長物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2冊。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臺北：文海出版社據明崇禎年間刊本影印，1970。

明・王世懋，《學圃雜疏》，收入《寶顏堂祕笈》，第17函。

明・王象晉，《二如亭群芳譜》，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2001，第80冊，據明末刻本影印。

明・王路，《花史左編》，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5-1997，子部第82冊，據明萬曆四十六年 (1618) 綠綺軒刻本影印。

明・王誥、劉雨纂修，正德《江寧縣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第24冊，據明正德年間刊本影印。

明・王鏊等纂修，正德《姑蘇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明正德元年 (1506) 刊本影印，1965。

明・王穉登，《謀野集》，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年間郁氏玉樹堂刻十卷本。
明・史鑑，《西村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9冊。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58。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58。
明・朱察卿，《朱邦憲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45冊，據明萬曆六年 (1578) 朱家法刻增修本影印。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08冊，據明末刻清康熙年間李瑁重刻本影印。
明・李日華著，《味水軒日記》，屠友祥校註，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明・周文華，《汝南圃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81冊，據明萬曆四十八年 (1620) 書帶齋刻本影印。
明・唐順之，《重刊校正唐荊川先生文集》，東京：高橋情報據明嘉靖三十二年 (1553) 刊本影印，1991。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4冊，據明崇禎二年 (1629) 刻本影印。
明・郝璧，《郝蘭石集》，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第586冊，據清順治吳芷刻本影印。
明・高啓著，《高青丘集》，清・金檀輯注，徐澄宇、沈北宗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明・高濂，《雅尚齋遵生八牋》，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61冊，據明萬曆十九年自刻本縮印。
明・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明崇禎年間刻本抄補本影印，1986。
明・張應文，《羅鍾齋蘭譜》，收入《美術叢書》，上海：神州國光社，1928，四集第十輯第139冊。
明・陳威、顧清纂修，正德《松江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第5-6冊，據明正德九年 (1514) 刊本影印。
明・陳善等修，萬曆《杭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明萬曆七年 (1579) 刊本影印，1983。
明・陸容撰，佚之點校，《菽園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明・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59。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64-165冊，據明萬曆四十四年 (1616) 刻本影印。

明・黃省曾，《吳風錄》，收入明・馮夢龍輯，《明人百家小說》，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明末刻本，第52帙。
明・葉權撰，《賢博編》，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
明・蕭士瑋，《南歸日記》，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08冊，據清光緒年間刊本影印。
明・謝肇淛撰，《五雜俎》，印曉峰點校，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明・韓浚等修，萬曆《嘉定縣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08-209冊，據明萬曆三十三年 (1605) 刻本影印。
明・歸有光撰，《震川先生集》，周本淳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明・蘇祐、楊循吉纂修，嘉靖《吳邑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10冊，據明嘉靖年間刊本鈔補本影印。
明・顧起元撰，《客座贅語》，譚棣華、陳稼禾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
清・尹會一、程夢星等修纂，雍正《揚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雍正十一年 (1733) 刊本影印，1975。
清・方文，《嵞山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000，第1440冊，據清康熙二十八年 (1689) 刊本影印。
清・方以智，《物理小識》，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年 (1884) 重刊本。
清・方時軒，《樹蕙編》，收入《邃園叢書》，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民國三十三年 (1944) 吳興周延年彙編本，第9冊。
清・方薰繪，《太平歡樂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五年 (1889) 重刊石印本。
清・毛祥麟撰，《墨餘錄》，畢萬忱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清・王芑孫，《淵雅堂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80-1481冊，據清嘉慶年間刻本影印。
清・王鳴盛，《練川雜詠》，收入王之增輯，《先澤殘存》，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民國十五年 (1926) 校正重刊鉛字本。
清・王應奎撰，《柳南隨筆》，王彬、嚴英俊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
清・王韜著，《瀛壖雜志》，沈恒春、楊其民標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清・玉魷生，《海陬冶遊錄》，收入朱劍芒編，《章臺紀勝名著叢刊》，上海：世界書局，1936，第12種。

清・甘熙，《白下瑣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六年 (1890) 築野堂刻本。
清・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66冊，據清寫刻獨學廬全稿影印。
清・朱克柔，《第一香筆記》，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元年 (1796) 刊本。
清・池志澂著，《滬游夢影》，胡珠生標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清・艾衲居士著，《豆棚閒話》，王秀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0。
清・余懷著，《板橋雜記》，李金堂校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清・佚名，《杭俗怡情碎錦》，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稿本影印，1987。
清・吳友如，《吳友如畫寶》，上海：上海古籍書店據清光緒三十四年 (1908) 上海文瑞樓書局石印本影印，1983。
清・吳偉業著，《吳梅村全集》，李學穎集評標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清・吳履震，《五茸志逸》，上海：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標點本，1963。
清・李斗著，《揚州名勝錄》，蔣孝達校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清・李斗著，《揚州畫舫錄》，汪北平、涂雨公校點，北京：中華書局，1960。
清・李漁，《閒情偶寄》，臺北：長安出版社影印，1990。
清・沈復著，《浮生六記》，唐紹華校註，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5。
清・沈葵增修，咸豐《紫隄村志》，上海：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標點本，1961。
清・沈德潛、顧詒祿修纂，乾隆《元和縣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696冊，據清乾隆二十六年 (1761) 刻本影印。
清・汪士鐸等修纂，同治《上江兩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同治十三年 (1874) 刻本影印，1970。
清・阮元撰，《揅經室集》，鄧經元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3。
清・屈大均著，《廣東新語》，李默校點，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林蘇門，《邗江三百吟》，收入《中國風土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3，第27冊，據清嘉慶十三年 (1808) 刻本影印。
清・邵長蘅，《邵子湘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7-248冊，據清康熙刻本影印。
清・金元鈺，《竹人錄》，收入《美術叢書》，二集第五輯第60冊。
清・金鰲輯，《金陵待徵錄》，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道光二十四年 (1844) 刻本鈔本影印，1983。
清・冒襄，《巢民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99冊，據清康熙年間刻本影印。

清・范祖述撰，民國・洪如嵩補輯，《杭俗遺風》，杭州：六藝書局，1928。
清・計楠，《牡丹譜》，收入《昭代叢書》，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三年 (1833) 吳江沈氏世楷堂刊本，辛集卷四七。
清・計楠，《菊說》，收入《昭代叢書》，辛集卷四九。
清・孫原湘，《天真閣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87-1488冊，據清嘉慶五年 (1800) 刻增修本影印。
清・徐傅編，王金庸補輯，光緒《光福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二十六年 (1900) 修民國十八年 (1929) 重印本影印，1983。
清・徐揚繪，《姑蘇繁華圖》，北京：文物出版社影印，1999。
清・珠泉居士，《續板橋雜記》，收入《章臺紀勝名著叢刊》，第2種。
清・祝德麟，《悅親樓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62-1463冊，據清嘉慶二年 (1797) 姑蘇刻本影印。
清・秦榮光著，《上海縣竹枝詞》，呂素勤標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清・納蘭常安，《宦遊筆記》，臺北：廣文書局據清乾隆十一年 (1746) 刊本影印，1971。
清・袁世俊，《蘭言述略》，臺北：廣文書局據清光緒二十三年 (1897) 重刊本影印，1976。
清・袁枚著，《小倉山房詩文集》，周本淳標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清・袁枚著，《續子不語》，鍾明奇校點，收入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第4冊。
清・袁景瀾（袁學瀾）撰，《吳郡歲華紀麗》，甘蘭經、吳琴校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清・袁學瀾，《吳俗諷喻詩》，收入《中國風土志叢刊》，第35冊，據《適園叢稿》本影印。
清・袁學瀾，《姑蘇竹枝詞》、《續姑蘇竹枝詞》，收入《中國風土志叢刊》，第43冊，據《適園叢稿》本影印。
清・高士奇，《北墅抱甕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82冊，據清康熙年間刻本影印。
清・高士奇，《獨旦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柒輯第26冊，據清康熙年間刻本影印。
清・崔華、張萬壽纂修，康熙《揚州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14冊，據清康熙年間刻本影印。

清・張岱撰，《西湖夢尋》，馬興榮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清・張春華，《滬城歲事衢歌》，收入《中國風土志叢刊》，第43冊，據民國《上海掌故叢書》本影印。
清・張英，《文端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9冊。
清・張雲璈，《簡松草堂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71冊，據清道光年間《三影閣叢書》本影印。
清・張塤，《竹葉庵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49冊，據清乾隆五十一年 (1786) 刻本影印。
清・捧花生，《畫舫餘譚》，收入《章臺紀勝名著叢刊》，第5種。
清・曹溶，《倦圃蒔植記》、《倦圃蒔植記總論》，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82冊，據清抄本影印。
清・許惟枚，《瀛海掌錄》，上海：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標點本，1963。
清・陳玉璂，《學文堂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47-48冊，據清康熙刻本影印。
清・陳作霖，《金陵物產風土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四年 (1908) 陳氏可園刊印本。
清・陳淏子輯，《花鏡》，伊欽恒校注，北京：農業出版社，1993。
清・陸以湉撰，《冷廬雜識》，崔凡芝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4。
清・陸廷燦，《南村隨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16冊，據清雍正十三年 (1735) 陸氏壽椿堂刻本影印。
清・陶孚尹，《欣然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2001，第3冊，據清康熙五十一年陶士銓刻本影印。
清・彭孫貽，《茗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據清海鹽張氏涉園藏寫本影印，1975。
清・惺庵居士，《望江南百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民國陳恆和輯《揚州叢刻》本。
清・曾燠，《賞雨茅屋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84冊，據清嘉慶二十四年刻增修本影印。
清・黃式權著，《淞南夢影錄》，鄭祖安標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清・黃凱鈞，《遣睡雜言》，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陸輯第20冊，據清嘉慶二十年 (1805) 友漁齋刻本影印。
清・楊光輔著，《淞南樂府》，許敏標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清・楊震福等修纂，光緒《嘉定縣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 (1881) 刻本。

清・葛元煦撰，《滬遊雜記》，鄭祖安標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清・董棨繪，《太平歡樂圖》，北京：學林出版社影印，2003。
清・箇中生，《吳門畫舫續錄》，收入《章臺紀勝名著叢刊》，第8種。
清・褚人穫，《堅瓠續集》，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二十三編》，臺北：新興書局，1985，第9冊，據民國三年 (1914) 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影印。
清・趙俞，《紺寒亭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55冊，據清康熙年間刻本影印。
清・趙翼撰，《甌北集》，李學穎、曹光甫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清・趙懷玉，《亦有生齋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69-1470冊，據清道光元年 (1821) 刻本影印。
清・劉廷璣撰，《在園雜志》，張守謙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5。
清・劉嗣綰，《尚絅堂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85冊，據清道光六年 (1826) 大樹園刻本影印。
清・劉聲木撰，《萇楚齋隨筆》，劉篤齡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8。
清・劉鑾，《五石瓠》，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九年 (1940)《庚辰叢編》排印本。
清・厲秀芳，《真州竹枝詞》，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鉛字標點本，1958。
清・厲鶚著，《樊榭山房集》，清・董兆熊注，陳九思標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清・鄭燮著，《鄭板橋集詳註》，王錫榮註，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清・錢大昕撰，《潛研堂詩集》，陳文和點校，收入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第10冊。
清・錢泳撰，《履園叢話》，張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79。
清・錢肇然編，乾隆《續外岡志》，上海：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標點本，1961。
清・戴殿泗，《風希堂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71冊，據清道光八年 (1828) 九靈山房刻本影印。
清・歸莊，《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輯錄標點本影印，1984。
清・顧湄纂，康熙《虎丘山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一年 (1702) 懷嵩堂刻本。
清・顧雲濤撰，《吳門表隱》，甘蘭經、吳雨窗、吳琴標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清・顧祿，《桐橋倚櫂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道光年間刊本。
清・顧祿撰，《清嘉錄》，王邁校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清・龔自珍著，《龔自珍全集》，王佩諍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王利器等編，《歷代竹枝詞》，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
王振世著，《揚州覽勝錄》，蔣孝達校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江蘇省博物館編，《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59。
吳馨等修纂，民國《上海縣續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七年 (1918) 刻本影印，1970。
夏仁虎，《歲華憶語》，南京：南京出版社標點本，2006。
夏友蘭等編，《揚州竹枝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徐謙芳，《揚州風土記略》，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趙明等編，《江蘇竹枝詞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潘宗鼎，《金陵歲時記》，南京：南京出版社標點本，2006。
顧秉權編，《上海洋場竹枝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顧秉權編，《上海歷代竹枝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龔嘉儁等修纂，民國《杭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十一年 (1922) 鉛印本影印，1983。

二・近人論著

Jack Goody 著，楊惠君譯
2004 《飲食與愛情：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王書奴
1934 《中國娼妓史》，上海：生活書店。
王賽時
1994 〈明清時期北京的花卉業〉，《古今農業》1994.3：30-38。
王鴻泰
2004 〈閒情雅致——明清文人的生活經營與品賞文化〉，《故宮學術季刊》22.1：69-97。
2006 〈雅俗的辯證——明代賞玩文化的流行與士商關係的交錯〉，《新史學》17.4：73-144。
任常泰、孟亞男
1993 《中國園林史》，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朱倩如
2003 《明人的居家生活》，宜蘭：明史研究小組。
何小顏
1999 《花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
吳存浩
1996 《中國農業史》，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
李春棠
1993 《坊牆倒塌以後——宋代城市生活長卷》，長沙：湖南出版社。
李樹華
2005 《中國盆景文化史》，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
汪子春、范楚玉
1998 《中華文化通志・科學技術典・農學與生物學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維權
1990 《中國古典園林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周肇基
1995 〈花城廣州及芳村花卉業的歷史考察〉，《中國科技史料》16.3：3-15。
邱仲麟
2007a 〈宜目宜鼻——明清文人對於瓶花與盆景之賞玩〉，發表於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辦，「明清文化生活與集體記憶」研討會，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07.05.28-30。
2007b 〈明清江浙文人的看花局與訪花活動〉，《淡江史學》18，待刊稿。
金學智
1990 《中國園林美學》，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
南京農業大學等編著
1990 《太湖地區農業史稿》，北京：農業出版社。
施春煜
2005 〈明清虎丘花市〉，《滄州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5.1：61-62。
洗劍民、許五洲
2005 〈清代廣州的花卉消費〉，《江蘇商論》2005.5：163-164。
胡一民
1999 〈論我國元代的盆景技藝〉，《廣東園林》1999.3：23-24, 42。

范金民
1998 《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3 〈清代蘇州城市工商繁華的寫照——《姑蘇繁華圖》〉，《史林》2003.5：104-115。
韋金笙
1991 〈中國盆景史略〉，《中國園林》7.2：11-20。
唐啓寧
1985 《中國農史稿》，北京：農業出版社。
徐波
2000 〈清代盆景文化之個案研究〉，《上海大學學報》7.2：53-57。
徐泓
1986 〈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爲例〉，《東亞文化》（漢城，今首爾）24：83-110。
張忠民
1990 《上海：從開發走向開放，1368-1842》，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曹林娣
2001 《中國園林藝術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梁家勉
1989 《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北京：農業出版社。
郭松義
1982 〈清代國內的海運貿易〉，《清史論叢・第四輯》，北京：中華書局，頁92-110。
陳文華
1991 《中國古代農業科技史圖譜》，北京：農業出版社。
2005 《中國古代農業文明史》，南昌：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6 〈宋元明清時期的花卉種植業〉，《農業考古》2006.1：216-222。
陳俊愉、程緒珂主編
1990 《中國花經》，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陳學文
1997 《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
程兆熊
1985 《中華園藝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程里堯主編
1999 《中國古典園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舒迎瀾
1990 〈我國古代的花卉栽培〉，《自然科學史研究》9.4：357-365。
1993 《古代花卉》，北京：農業出版社。
黃長椿
1990 〈明代江西贛州的種花業〉，《農業考古》1990.1：209-210, 213。
葉靜淵
1987 〈我國明清時期的花卉栽培〉，《農業考古》1987.2：308-315。
魏華仙
2006 《宋代四類物品的生產和消費研究》，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
魏嘉瓚
2005 《蘇州古典園林史》，上海：三聯書店。
魏露苓
1996 〈明清植物譜錄中的農林園藝技術〉，《農業考古》1996.3：228-234, 238。
嚴奇岩
2003 〈淺談明清雲南花卉資源的開發〉，《農業考古》2003.3：230-233。
仲摩照久編
1930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第三卷・支那下》，東京：新光社。
森正夫
1988 《明代江南土地制度の研究》，京都：同朋舍。
Clunas, Craig
1991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Goody, Jack
1993 *The Culture of Flow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邱仲麟

Gardeners and Flower Shops: Flower Cultivation and Gardening Markets in Jiangna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ung-lin Ch'iu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During the Ming-Qing era, due to the number of literati, wealthy people and courtesans in the Jiangnan area, as well as the high frequency of festive celebrations,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leisure activities, there was a huge demand for flowers. In many large cities such as Nanjing, Yangzhou, Suzhou, Hangzhou and Shanghai, several specialized gardening plantations appeared on the peripheries of the cities. Since the planting of flowers brought higher economic returns than the planting of rice crops, many agricultural farms were converted into flower farms, and a wide variety of flowers were planted.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at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the flower gardeners and flower merchants of Suzhou established the Trade Association of Flower Merchants, and a similar organization subsequently also appeared in Shanghai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is shows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and commercial ties between the members of the flower industry we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trong.

In order to attract the patronage of wealthy customers and increase profit, gardeners continually innovated their planting technologies to improve their breeds. At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greenhouse cultivation appeared in Yangzhou and Suzhou, and subsequently also appeared in Shanghai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s a result of this new technology, many flowers and plants which originally could only bloom in the springtime were now on the market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Chinese New Year's Day, and became highly coveted products which everyone rushed to purchase. Apart from greenhouse cultivation, the method of grafting was also used to plant flowers that were not originally found in Jiangnan. Due to stiff competition between various cities, there was a noticeable shift in each of the cultivation centers. For exampl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cultivation center for peonies shifted from Suzhou to Jiangyin, and then shifted to Shanghai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Jiading was originally famou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narcissus, but by the beginning period of the Qing era, this center

had already been surpassed by Nanjing. Faced with fierce competition, the gardeners would protect their breeding and planting technologies and prevent third parties from obtaining such secrets. One such example is the Jiading bonsai.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bonsai in Nanjing and Suzhou each has its own thriving local market. By the beginning of the 17th century, the bonsai in Jiading had made an impressive entry into the market due to its unique features, and soon became the most popular product in Jiangnan. Although bonsai cultivation was prevalent in Suzhou, Yangzhou and Hangzhou up until the Qing Dynasty, the Jiading bonsai continued to be relatively popular, primarily due to the fact that its shape resembled the trees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In terms of economic trading, Jiangnan was the biggest flower consumption market during the Ming-Qing era. Its trade network had Suzhou as the center, and extended into the northwest to Nanjing, into the north to Yangzhou, and into the southwest to Hangzhou, thereby forming a market hub that covered 250 kilometers. Since flower trading and selling were primarily carried out using the waterways, vessel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flower farmers and merchants even made use of passenger ships that operated at night to transport the flowers and plants into the cities to be sold the next day. The network of flower trading in Jiangnan during the Ming-Qing era formed a spider-like web, and the density of this network was unprecedented in history. Apart from the mutual trading between various cities in Jiangnan, many flowers from Jiangxi and Fujian (such as the jasmine and orchid) were also transported to the big cities in Jiangnan through the waterways or on land.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custom controls for the export of goods from the coastal regions along the southeastern sea were gradually relaxed, and jasmine and orchids from Fujian and Guangzhou were transported to Jiangnan by the sea.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trading hub, the volume of goods that were supplied and the rate of goods that were received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Moreover, following the increase of trade with overseas countries, flowers from overseas also entered into the domestic market, becoming the new novelties on the market. The sale of flowers and plants spurred the emergence of a series of auxiliary products and services, each of which had its own niche market, thus existing harmoniously alongside each other. Middlemen who shuttled between buyers and

sellers would receive a commission upon a successful transaction. Some flower merchants would go directly to the gardens to place their orders, but most of the flowers and plants were harvested and then carried to the cities by the gardeners themselves, or were peddled along the streets. In addition, customers could even rent flowers and plants in Nanjing during the Ming era, and in Yangzhou and Hangzhou during the Qing er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gardeners in Yangzhou would help the customers to arrange the flowers and plants in their gardens, and even provide warranty services.

Keywords: The Trade Association of Flower Merchants, greenhouse cultivation, bonsai style, technology secrets, trade network